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1

一九六五年

心中要有两个“的”	李淑兰 (1)
敢拼敢闖, 敢于胜利	梁小牧 (5)
《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启发	黃家駒 (8)

工 辦 农 証 兵 法 談 法	坚持一分为二, 建設四好連队	曾春义 (14)
	反对“合二而一”, 坚持思想革命	蕭品科 (16)
	一分为二是工人阶级的法宝	凌惠款 (18)

小农經濟和社会主义工业結合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嗎? ——評楊献珍同志的“綜合經濟基础論”	吳俊光 (21)
略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谷 娟 (27)
是“不朽的”, 还是腐朽的?	李家喜 (32)
——对馮定的《革命的人生是不朽的》一文的批判	

生产价格論是资产阶级的經濟主张	張維靜 (36)
駁生产价格論者的一个論点	陈宝栋 (38)
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評價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	伍 旭 (40)
生产价格論是要取消党的价格政策的謬論	梁之良 唐 崧 (42)
生产价格論的基本理論依据的虛構性	陈肇斌 (46)

略論以阶级斗争促进农业生产斗争	許士杰 (53)
农业生产中的因地制宜与农业生产合理布局	李 穎 (59)
对“利潤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的商榷	周治平 蕭 凡 (65)

关于科学抽象的具体內容	章 沛 (68)
——《論持久战》中的邏輯問題初探	

評《三家巷》《苦斗》評論中的錯誤傾向	文齐思 (74)
--------------------------	----------

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間对中国的侵略簡述	王志光 (82)
刘节先生的“抽象繼承法”批判	魏俊超 (87)
李秀成評價問題上的相对主义	洪 雁 (92)
——評苑书义、呂翼祖等同志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动态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徐寅生講話和《人民日报》編者按語座談紀要 (11)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球。可是，所有从事理论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的同志们，都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

——摘自《人民日报》对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的编者按语

心中要有两个“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射箭运动员 李淑兰

读了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之后，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真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许多话，都说到我们射箭运动员的心上来了。现在就来谈谈一些学习体会，作为向同志们的汇报，也作为对自己今后前进的一种鞭策。

就从把祖国荣誉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谈起吧。徐寅生同志说：“运动员不应当以个人得失考虑自己的活动，而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我想，这是每个运动员都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由于徐寅生同志解决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有了前进的最伟大的动力，也有了前进的最明确的目标。射箭是为了中的，这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但是，这个“的”，不但是靶场上的“黄心”，而且更重要的是祖国的荣誉。我们的射箭技术，一定要用来为祖国的荣誉服务。这个问题解决得愈好，思想修养进步就愈快，射箭技术水平提高就愈快。

回想起来，一九六一年一月，我刚到解放军体育学院射箭队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那时，领导同志也多次对我们说过，运动员就是要为祖国争取荣誉。我呢？听是听了，但在思想上却打了一个折扣，根本没有想到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打破世界纪录的问题，想到的只是，能达到我们射箭队里老运动员的水平就不错了。那时，不但“没有把比赛对手搞明确”，而且连练习的目标也没有搞明确。后来，我们队的王锡华同志在上海参加比赛的时候，一举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我们非常高兴。同时，也推动我真正去考虑怎样为祖国争取荣誉的问题。从此，我下定决心：攀登世界体

育高峰，把青春獻給祖國的體育事業。過去，我射箭的動作毛病很多，也想不出多少辦法去克服它，這時，由於自己思想明确了，腦子也就靈了許多，在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想出了一些辦法來克服毛病。打從這時起，我也就開始敢拼、敢闖了，徐寅生同志說：“……經過思想鬥爭，思想有了提高，情況就不同了，有了膽量，敢於去闖了。”這話很對。當然，敢拼、敢闖也要有一個鍛煉的過程，最初，我還只想到，能夠打破一項世界紀錄就好了。打破了一次世界紀錄以後，又想到要打破兩項、三項……打破更多的世界紀錄。每打破一項世界紀錄，回過頭來再看，就覺得原先認為難於攀登的體育高峰，都不是頂峰，頂峰還在後頭，這就不斷地加強了自己對打破世界紀錄的決心，覺得應該不斷地攀登新的高峰，也可以不斷地攀登新的高峰，打破更多更多的世界紀錄。到了一九六三年參加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前夕，我就只想到要第一，不要第二，一定要為祖國爭取榮譽。回想起來，正是因為自己有了這樣的決心，才能够在不利的條件下“頂得住”，在比賽中取得冠軍。

要為祖國爭取榮譽，為祖國爭氣，一定要自己先爭氣，不要看不起自己，承認自己不是這方面的“材料”，要是這樣，那還有什麼雄心壯志呢？徐寅生同志說得對，如果連自己都承認不是這方面的“材料”，也就沒有辦法成“材”。雖說我身材高大，但並沒有“身大力不虧”的優點，加上我胳膊不直，小臂又短，我最初來射箭隊的時候，用盡氣力，才勉強把三十來磅的竹弓拉开。當時，就有人說我練習射箭沒有什麼前途。說真的，听了這些話，我心里真是不服氣。我想，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只要听黨的話，勤學苦練，我就不信我射不好箭。後來我學了毛主席的《愚公移山》，我的信心就更強了。思想上爭氣，身體也就能爭氣了。在訓練過程中，運動量很大，開始時全身都痛，但我決心堅持下來。堅持下來了，身體就由不爭氣轉變為爭氣了。事實上，哪有一個人的身體開始就完全爭氣的呢？如果是，也就不需要什麼訓練了。

要為祖國爭取榮譽，一定要不斷和自己的個人主義的“雜念”作鬥爭。不然，“雜念”多了，就會射不出什麼水平來。一九六二年，在呼和浩特參加全國射箭錦標賽時，雖然取得了冠軍，但是因為當時控制不了過於緊張的心情，最後幾組箭射得不好，沒有突破七十米雙輪世界紀錄。相反，在一九六三年全國射箭通訊比賽中，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訓，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排除了雜念，終於突破了五項世界紀錄。一九六三年冬訓時，我的成績不好，這不是由於驕傲，而是怕人說自己驕傲，在這種患得患失的精神狀態下，那能射出什麼水平來呢？克服了这个錯誤思想以後，自己又進步了。

我想，一個射箭運動員，首先要思想過硬，不但要能打順利仗，也一定要能打惡仗。比賽，就是要解決誰勝誰負的問題。在比賽過程中，我暫時領先是可能的，對方暫時領先也是可能的。暫時領先並不等於勝利，暫時落後也不等於失敗。許多運動員在領先的情況下，思想一般是比較輕鬆的，但是在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往往會產生輸定了的念頭。我的體會是，在暫時落後的情況下，也不應過分緊張，心慌意亂，這樣才能集中精力射好箭，爭取主動，反敗為勝。事實上，在比賽過程中，哪有雙方同時占上風的呢？

不是你压着我，就是我压着你，势均力敌的情况，只是暂时的现象，如果你给人家压住了，你就顶不住，那怎能有什么“搏”劲来反过来压倒人家呢？这不是向对手认输吗？我想一定不能这样做。一九六四年，在一次比赛中，在只剩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的对手比我多30分，我被压住了。但是，就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我没有灰心，而且决心拼到底，在靶场上，我默诵了毛主席的话：“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想在眼前落后的情况下要赶上去，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付沉重的担子，我一定要敢挑起来，挑得好。这样就专心一意地射箭，分分必争，箭箭认真，结果取得了胜利。我体会到，在比赛中，你越怕对手，就越射不好，越射不好，就越怕对方。其实，真象徐寅生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比赛中，往往是你怕我，我怕你。如果你不怕，那末，思想就占了上风，这样箭就会越射越好。纵使开头射得不理想，也能镇定冷静，分析技术上的毛病，想出办法来克服，如果心都乱了，还能想出什么法子来呢？

所以，一个运动员，要有两种准备，一种是打顺利仗的准备，在占上风的情况下，不做骄兵。在战术上轻视敌人，这是要吃亏的。另一种是打恶仗的准备，在不利的情况下，顶住它，拼到底，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千万不能打几个回合，就灰心丧气。我想，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要象徐寅生同志所说的那样，多想自己的有利条件，而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又要考虑到不利的情况。

说敢于斗争，指的不但是敢与对手斗争，还要敢与恶劣的天气作斗争。在射箭比赛时，是经常会碰到恶劣的天气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要顶得住。否则，你就不能赢得胜利。在实践中我体会到一条经验，就是思想上要经常准备碰上恶劣的天气。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北京参加新运会的选拔赛，正赶上那两天风沙很大，又是逆风瞄准，连眼睛都几乎睁不开，在首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克服了这些困难，取得了冠军，被选入我国体育代表团。十一月在雅加达参加新运会比赛时，碰到了两个大困难，这就是多变的风和炎热的天气。可是，我记起了党的教导，不怕炎热的天气，也不怕多变的风。比赛开始了，调皮的风又来捣蛋了，一忽儿从右边吹来，一忽儿又从左边吹来，不时还来个旋风。前三天比赛，虽然我一直领先，可是成绩并不理想。在最后一项三十米的比赛中，第一箭又被风吹得只中两环。在领导的教育下，我终于想出了办法，制服了调皮的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要为祖国争取荣誉，不但要思想过硬，而且一定要技术过硬。过硬的技术从何而来？过硬的技术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长时期的苦练和巧练。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启发我想到一个射箭运动员一定要从自己的特点出发来发挥技术水平。我的手臂短，射起箭来有人说姿势不优美，可是我觉得这样射很合适。手臂短，可以说是我的“特短”，但是，有了“特短”，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善于利用，也可以发挥特长。射箭是有基本功的，但是各人的身体条件不同，不能什么都用一个框框来套，这样才有自己的射箭风格。

只有平时能苦练、巧练，在比赛场上才能苦战、巧战。说起巧战，我觉得正象徐寅生同志所说的，要敢于冒险，照我的理解，这是指能对比赛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情况，大胆作出判断，针锋相对地采取新的战术来对付。这方面徐寅生同志已经把他的经验介绍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体会。在雅加达新运会比赛的最后一天，五十米双轮比赛时，一开始射得不错，可是射到第八组箭的时候，风向突然变了。我没有及时大胆修正瞄准点，结果出现了低环数，后来虽然尽力挽回，但是未能打破世界纪录。在最后一项三十米比赛中，第一枝箭又被风吹得只中两环，情况真是太严重了。这时候，领队来到我的身旁，对我说：“一定要对每枝箭都负高度的责任。”领队的話，使我鎮靜起来，脑子也开了窍，迅速地捕捉场内彩旗的飘向，大胆地修正了瞄准点，一箭一箭地补回了头一箭的损失。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成绩，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许多更高的体育高峰等待我去攀登。我还有许多缺点，需要去克服。徐寅生同志是我的一位好老师。我一定要向徐寅生同志学习，不断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李小櫻 整理）

敢拼敢闖，敢于胜利

广东羽毛球队運動員 梁小牧

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对我的教育很大，现在我来谈谈两点学习体会。

一、关于敢拼、敢闯、敢于胜利的问题。我想，一个运动员，一定要象徐寅生同志做到的那样，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我参加广东羽毛球队的最初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是认识不明确的。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想：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人，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正象毛主席说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而我是一个中国人，祖国正需要自己贡献力量时候，自己却处处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太不对了。我便下决心改造自己，要把祖国荣誉放在第一位，丢开个人的得失。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自己几年来在羽毛球比赛中还能取得一些成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神动力来鼓舞自己，使我在参加比赛时总是怀着夺取胜利的決心。我体会到在思想上有了夺取胜利的決心，才能敢拼、敢闯。敢要胜利，才敢于胜利。如果连胜利都不敢要，先在思想上认输了，那里还谈得上敢于斗争呢？心软手也软，打起羽毛球来还有什么干劲呢？这似乎是一条规律：首先要在思想上敢于胜利，才能在球场上取得胜利。在思想上做了失败者，也就要做球场上的失败者。一九六三年，我们和一个外国羽毛球队进行了一次比赛。这个外国羽毛球队是国际上第一流的羽毛球队。在比赛前，有的人还没有破除“迷信”，他们把外国羽毛球队说得很“神化”，说她们扣球非常准确，甚至每个球都落在边线上。我当时展开了思想斗争，觉得自己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技术水平不够高，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不了解对方的技术特点。但是，我又想到，我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的体力强，“打”不赢你，也要“拼”赢你，我打球的速度快，可以打乱你的阵脚。我虽然不了解对方的技术特点，对方也不是同样不了解我的技术特点么？在这方面，彼此都是一样的。真是象徐寅生同志所说的那样：“比赛中你怕我，我怕你，怕来怕去”。只要有信心，就会不怕对方，这样也就能在比赛中仔细分析对方，运用战术，驾驭对方。所

以我出场对战时，信心十足。最初一、二个回合虽然有点紧张，但是我想不管对手怎样高强，我都要打赢你。纵使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过大，打不过对手，我也要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风格，所以马上镇静下来，专心一意地打球，不考虑其他问题。结果第一局我取得了胜利。打到后来，我的脚扭伤了，叫不叫“暂停”呢？当时我想，现在正是我占上风的时候，应该继续打下去，不给对方有“喘息”的时间。我决定不顾脚痛，乘胜直追，结果在这一场比赛中打败了对方，取得了胜利，为祖国争取了荣誉。

去年，我们到国外去参加羽毛球比赛。起初我们队的一个运动员给外国的羽毛球运动员打败了，而我又曾败于我们队的那个运动员的。我心里又紧张起来。后来，我又把双方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觉得我们队的那位运动员的技术是比我高的，可是打球的速度不及我的快，而那位外国运动员呢？技术确实也很好，可是她最怕的就是速度快。这样，我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同时我不相信对方不怕我速度快这一条。所以在和她比赛的过程中，第一局虽然是我输了，但我仍然保持必胜的信心，不会束手无策，我抓住她的弱点，狠狠的打，我的“快球”，打得她招架不住。这样，我一方面在战略上藐视对方，一方面在战术上又重视对方，具体分析情况，用自己的特长来补自己的不足，用自己的特长来制服对方的特长。这样，我就反败为胜，终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徐寅生同志说：“现在看来，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多考虑国家利益，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可以长自己的志气。”我觉得这话非常对。几年来，我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想，在国内比赛中，也同样要敢拼敢闯，敢于胜利，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在一九六三年全国锦标赛时，我第一次碰到我国的一位名手。第一局我输了，但是我没有气馁。我那时想，不管你怎么硬，我也要尽最大努力，打出自己的风格，打出自己的水平，力争胜利。第二局我赢回一局，到第三局时，出现了“拉锯战”，双方争夺激烈，这时我想是考验我的时候了，“谁能坚持，谁就能胜利”。结果第三局我又打赢了。比赛结果，我取得了冠军。这是我第一次夺取全国羽毛球单打冠军。在那一次比赛中，我和另一位队员合作，又夺取了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这是我的正面经验。但是有时，我在国内和兄弟队进行比赛中，碰到名手，思想上还有顾虑，必胜的信心没有那么强烈，这样一来，就很难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往往就不能取得胜利。学习了徐寅生同志的讲话以后，我感到要更全面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二、关于练基本功和发挥技术特长的問題。徐寅生同志说，运动员一定要练好基本功，而且练习要和比赛、特别是和国际比赛结合起来。这一点是說中我的心事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和外国的羽毛球队进行比赛，有的人就觉得比来比去都在国内比，能应付过去就算了。我想，这样做对于祖国的体育事业是不負責任的。当一天运动员，就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运动员，就要尽到一个运动员的责任，就要勤学苦练，不断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所以我从不放松练习，也正因为自己坚持苦练，所以后来在国际比赛中才没有“吃亏”。我总结了一条经验教训：“练习场上贪图轻松，比赛场上就狼狼不堪。”应当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为了练体力，我坚持长跑和其他训练。在冬天往往练得喉咙干、鼻水流。有人说，这是“搵笨”。我看，这才是真正不“搵笨”，如果你平时不练，怎能上阵打胜仗呢？我想，我是一个革命者，是体育战线上的战士，一定要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战胜各种困难，为祖国争光。困难只能吓倒懦弱的人。我学了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后，苦练的决心又更坚决了。我经常用毛主席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有时练得实在很累了，一想起这句话时，就好像看到了胜利，劲头又来了。

徐寅生同志说，乒乓球运动员的基本功是很广泛的。我认为一个羽毛球运动员，也应该有过得硬的、比较全面的基本技术训练。我过去虽然注意基本技术训练，但把基本技术理解得过于狭窄，只着重于练体力，培养耐力，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够的。我还想到，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尽量减少自己的“特短”。要把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练好基本功结合起来。过去几年，我在一些比赛中没有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技术水平不够高，更具体地说，就是技术不够全面，虽然有自己的特长，但都不足以用来制服对手。我想，如果其他技术能不断提高，那不是能更好地发挥特长吗？所以，对于自己的技术特点，既看到它好的地方，又看到它不足之处，不断的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样，就可以更快的进步。

（林 叶 整理）

《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启发

华南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 黄家驹

学习了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收获很大。当前我们正在进行教育革命，实行半工半读，政治理论课教学也正在进行改革，学习这篇文章，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仅谈几点体会。

第一，要象徐寅生同志那样，有一颗为革命而工作，为祖国争荣誉的紅心，要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来对待革命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作好，才能在工作上作出成绩。徐寅生同志由于解决了为谁打球的问题，因此他就处处不计较个人得失，打起球来，就能勇于“搏斗”，善于学习，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正如他所說的，“只学技术，不学政治，政治不挂帅，球就打不好”。“运动员不应当以个人得失去考虑自己的活动，而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我们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深有体会的。如果不是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只热中于搞个人名利，关门读书，一心想成名成家，不愿搞思想工作，那么由于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的清除，当然也就不能对学生进行“兴无灭资”的教育，这样思想与业务都得不到提高。在党的教育下，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阶级斗争观念加强了，政治积极性提高了，明确地认识到必须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任务担当起来。许多教师与学生“三同”，与贫下中农子弟交朋友，与学生一起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和学生一起下乡、下厂、当兵，有的还和学生一起去参加清粪工人掏大粪，心里想的也不再是升等升级的个人主义打算，而是如何更多地了解同学情况，怎样更好地帮助同学学习和思想进步了。这样，整个系就充满了热腾腾的革命气氛。可见明确为谁工作，带着革命责任感和阶级责任感来工作是多么重要。

第二，我们作什么工作都应有个“敌情”观念。徐寅生同志看了解放军带着敌情观念去练兵，就想到也可以把乒乓球看作是蒋介石的脑袋，一板一板打起来该多有力量。徐寅生同志說的“敌情”观念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充分了解“敌人”活动情况，处处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徐寅生同志因为充分估计到对手打球的各种情况，因此就注意到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去对付对方，“敌情”观念越强，各种情况估计越充分，打起球来就越发主动，越有把握。我们搞政治理论课工作的“敌情”观念就是阶级斗争观

念，就是学生的活思想，就是时刻想着如何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有的教师“敌情”观念很薄弱。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人考虑自己进修提升比较多，脑袋里装了这些东西，资产阶级腐蚀和争夺青年的“敌情”观念当然就装不进去了，结果和这些“敌人”和平共处，很少去了解教育对象的情况，资产阶级从那些方面和我们争夺青年，采取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方式，各种不同情况的同学怎样受他们的影响等等。这样怎么能去战斗呢？现在教师都深入到同学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如对有些班作了关于世界观的调查，经过这些调查，对学生思想面貌的认识比过去清楚多了。由于了解了同学的思想，从学生的活思想出发进行教学，讲起课来就比较能做到有的放矢，解决活的思想问题，这样就加强了政治理论课的战斗性。

第三，要敢拼、敢闯。我觉得徐寅生同志的讲话特别值得学习的是他的敢拼、敢闯、敢搏的精神，我反复读了几遍“讲话”，特别喜欢的就是他这种拼劲。这是一种革命精神，是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的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相信人的因素第一，相信精神变物质的力量，相信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面前什么困难都可克服。这个“拼”不是蛮干，不是盲动，是具有明确方向的、坚强的革命斗志的表现，是对工作充满信心和决心的表现。而且，敢拼的精神，也是符合毛主席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指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三大革命实践中来，敢拼，就是敢于实践。拼胜利了，可以总结经验，失败了，何尝不可以总结教训，从而得到提高。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做了以后才有经验和体会的，只要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正确的政策，有了基本的措施，就应该大胆去干，什么事都要有了完整的办法才去干，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前怕龙后怕虎，那还有什么可干的呢？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所感受的。在教改之初，有些同志对教改措施有些疑虑，例如对待教师下班蹲点和“三同”的问题，有人就担心：这样下去，学生欢迎吗？会不会影响进修提高呢？会不会妨碍备课呢？个别同志对离开家里这个“安乐窝”，思想上也有斗争。后来一讨论，大家觉得应该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于是全系教师，除少数因身体或其他原因外都下去了，同学们看教师下来，高兴得很，亲热得很，什么事情都给老师说了，很快和老师交上朋友。有的教师过去一个学期还认识不到全班同学，现在一个星期就全都认识了，过去一个学期还掌握不到全班的基本情况，现在一两个星期就把班里同学的基本情况了解了。有些教师过去总是埋怨有些同学学习不好，脑袋“笨”得很，现在就不同了，了解他们的基础，研究他们的学习方法，带着阶级感情来帮助他们学习提高。由于逐步适应了新的情况，上课，备课，作学生工作等都作了适当安排，原来担心妨碍备课的疑虑也消除了。回想起来，要不是最初决心大，说干就干，那里会有今天这些体会呢？一年来教学改革和教师思想革命化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想把工作作好，就要敢于改革，敢于实践，只要方向对头，就要有“拼”、“闯”、“搏”的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

神，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第四，要学习徐寅生同志那样，做到思想过硬和技术过硬。“拼”之所以不是蛮干、盲动，就是因为有过硬的功夫为基础。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首先要思想过硬，这就是要敢于挑重担子，勇于克服困难，要激流勇进。磨炼多了，碰到困难，自然就能做到临危不惧，从容不迫，顶得住。而且，有了思想过硬，技术过硬才有思想基础。徐寅生同志随时随地都在磨炼自己，刻苦锻炼，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善于联想，因此打起乒乓球来，就镇定从容，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作为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是一名敢于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战士，因此既要会讲课，又要会作思想工作；既要搞理论，又要下乡、下厂、当兵，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还要懂得作调查研究。要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革命接班人，自己首先应该是个革命者。不少同志已经越来越感到过硬的重要，自己过硬才能要求同学过硬。这学期以来，许多同志无论在政治上、业务上、劳动方面都提出了高标准，“严”字当头，真正扎扎实实地去干，比方民兵锻炼，有的同志过去强调工作忙、年纪大、身体差，很少参加。这学期就大不相同，大家都参加，有操练、有射击，搞得很活跃。又如不少教师跟学生一起修水库，白天和学生挑土，晚上指导学生学毛主席著作，劳动二个月后和同学坚持徒步走九十里路回来。如此等等。现在大家都要求全面地锻炼自己，提出思想过硬，业务过硬，劳动过硬等要求，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总之，徐寅生同志的讲话是一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虽然讲的是打乒乓球的事情，对我们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有很大的启发，读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再对照自己的实践，许多问题认识得更加明确深刻了。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

徐寅生讲话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座谈纪要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近来认真学习了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从中得到很大启发，学到许多东西。广东哲学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教育学会、图书馆学学会和语言文学学会筹备委员会，为了交流学习的情况和促进学习的进一步开展，于一月下旬分别举行了座谈会。

各个座谈会上的发言都很热烈。大家一致认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所指出的，确实是一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经过了学习和讨论，深深地感到从事理论工作、教学工作的人，可以从这个讲话中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下面就是各个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学习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就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

在哲学界的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徐寅生同志谈的虽然是关于打乒乓球的事情，但他却处处都提高到世界观的问题，即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这个讲话所总结出来的打乒乓球的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方法问题，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因而具有普遍意义，这主要是徐寅生同志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所以，他能够从打球中认识真理。

在各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者，都从不同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徐寅生讲话的这个特点。教育学界在座谈中认为，这个讲话虽然没有一个哲学术语，但实际上它却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了十多对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诸如政治与技术，集体与个人，“战时”的攻击与平时的训练，学习与创造，进攻与防守，正规动作与“非正规动作”，特长与“特短”，比赛时我怕你、你也怕我等等矛盾关系。讲话中处处充满“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和革命精神，写得有血有肉，谈得生动、实际、问题提得高，又分析得深，很有说服力。

经过了分析和讨论，大家认识到要从徐寅生同志的讲话中学到东西，首先应该端正学习态度：凡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是真理，就应该学；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是真理，就不应该学。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各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者，都从学习徐寅生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中，联系到自己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大家认为，在学习这个讲话时，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徐寅生同志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正确处理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红与

专的关系問題，也就是能够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一位語言文学工作者說：徐寅生同志明确为誰打球，把爭取祖国荣誉放在第一位，做到身在球场、胸怀祖国，这对我們有很大的启发。只有把祖国荣誉放在第一位的人，才能够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工作。我們做教学工作的人，也應該是身在課堂，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以往，我就是教书不教人，沒考虑到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革命的接班人，也沒有深刻認識到教育工作是革命的工作。这說明自己长期存在个人主义思想，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所以，工作顺利，有了一些成績，就自滿起来，产生了“驕气”，工作不順利，碰到了困难，就沒有信心，产生了“娇气”。这次在学习徐寅生同志的講話中，我特別深刻地感到，要做到“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必須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因为只有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一位哲学工作者說：徐寅生同志的講話提到“人生能有几回‘搏’”。对我們知識分子來說，首先就是要敢于把自己思想中的个人主义都“搏”光。不“搏”掉个人主义，是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

在紅与专关系問題上，大家的感受也很多。认为：从徐寅生同志的講話看来，他能够正确处理紅与专的关系問題，主要是坚持政治挂帅，以紅带专，首先解决思想过硬的問題。在图书馆学学会和哲学学会座談会上，发言者认为徐寅生同志在技术上所以能够过硬，首先是由于他在思想上过得硬。思想不过硬，业务也就不能过硬。搞理論工作的人，也必須做到首先思想过硬。有的說，过去自己搞理論工作，也知道要为人民服务，但却沒有象徐寅生同志那样，从大处着眼，从具体行动做起，注重平时的鍛炼，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地要求；沒有象徐寅生同志那样，一抓起球拍就想到要为祖国爭荣誉。在碰到具体問題的时候，却往往从个人利益出发，患得患失，在困难的面前，沒有“搏”的精神。因此，在业务上也就不能过硬。許多人还談到，我們搞政治理論教学工作，就是要同资产阶级爭夺青年，如果自己的思想不过硬，不敢首先同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搏”，那么，在同资产阶级爭夺青年的斗争中，也就不可能真正“搏”起来。

好些經濟学和語言文学工作者还认为：紅专問題，我們已經提了好多年了，可是还没有解决得好，主要原因就是思想不过硬。我們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业务上过得硬。徐寅生同志給我們树立了又紅又专的榜样。紅是灯塔，如果我們“专”的方向錯了，那是很危险的。

許多发言者在談到理論、学术界如何才能做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时，都一致指出，根本問題是立场、世界观的彻底改造。一位教育理論工作者說：我們有些人过去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往往只是为了找寻自己所需要的“論据”，而不是把它作为“思想武器”，用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因此，学了之后，記得的多是一些概念、詞句，沒有掌握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写起文章来，頂多就只能引用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詞句，而不能真正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問題。而徐寅生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广大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样，都有共同的特点：学，完

全是为了用，学用一致。所以他們能把毛泽东思想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一点，正是我們理論工作者應該認真学习的。

历史学界的座談会上，有的发言者說：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告訴我們，世界观的改造既不是輕而易举的，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問題在于有无自我改造的决心，在于能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各个座談会在討論和学习关于紅与专的关系問題时，大家都表示今后要以徐寅生同志为榜样，正确地处理紅专关系問題，坚决走又紅又专的道路。

必須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

通过这次学习徐寅生讲话，許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更加具体地感到：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除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使自己的科学研究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之外，必須彻底改变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学风，树立从实际出发，調查研究，理論联系实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

教育学界的发言說：徐寅生讲话，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吃透两头”。一头是認真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用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打球的指导思想；一头是深入調查研究打乒乓球的具体实践。我們从事科学研究，也要吃透这两头。可是，在我們的具体研究工作中，却往往是“只吃中間”，就是只抓住一些条条、框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是言之无物，什么問題也沒有解决。他們表示今后一定要認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深入实际，进行調查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会上还有人說：我国解放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但我們搞理論工作的却没有象徐寅生同志那样，做艰苦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所以写文章也好，总结也好，搞不出象样的东西。徐寅生同志的文章能写得这样好，就是因为他一反从书本出发，抛开一切框框条条，經常对国内外乒乓球运动方面的情况进行調查研究，因此他就能做到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写出来的东西，就有战斗性。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們要努力学习和提倡調查研究、理論联系实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

在經济学会、历史学会、图书馆学学会的座談会上，大家都认为，徐寅生讲话中說到帶着敌情观念打球，把乒乓球作为蔣介石的头来打，这对我們也是很好的启发。当前在思想文化領域中还存在无产階級思想与資产階級思想的严重斗争。因此，我們在理論工作上，在学校教学工作中，也要象徐寅生同志那样，具有强烈的革命的階級感情，帶着“敌情”观念去从事理論工作、去教好每一堂課，进行“兴无灭資”的斗争。

各个座談会上的发言者，都觉得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这个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編者按語，內容极其丰富深刻，对从事理論工作、教学工作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应当繼續認真地进一步学习研究，把它当作一份很好的教材。同时，要联系自己的具体实践，認真学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彻底改造自己的学风。

坚持一分为二，建設四好連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营教导員 曾春义

最近在各種报刊、杂志上，展开了对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批判。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非常荒謬的。如他說：“矛盾的統一，只是說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这就是說矛盾的双方只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既沒有斗争，更沒有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轉化。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怎么能說这是辯証法呢？他还說到：“学对立統一規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这是一种什么本事呢？根本不是通过斗争解决矛盾的本事，而是道道地地的否認斗争調和矛盾的“本事”。为什么我們要坚决地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謬論呢？因为他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又伪装成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就更容易欺騙群众。如果让其传播下去，对我们的革命工作，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就拿我們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來說明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的正确性，“合二而一”論的危害性。

在創造四好連队的运动中，我們得到一条极为深刻的經驗教訓，就是对待連队的工作，必需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分为二，否則是不可能創造四好連队的；四好連队如果不繼續坚持一分为二也就不能保持四好。

我們营有两个連續三年的四好連队。一个是广州部队的标兵連，今年又获得了

四好的称号；一个是連續三年的四好連队，今年却掉队了。为什么一个連队能不断前进，而另一个却掉队了呢？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能否坚持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去建設連队。

先說标兵連：从开始創造四好連队以来，一直是四好連队。他們学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在工作中十分重視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問題。例如一九六一年初，創造四好連队时，在上級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几項主要的工作都取得較好的成績。但是过了不久，連队就出现了一些問題。这时党支部便按照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了連队的情况，找出了当时思想上的主要矛盾，就是謙虛謹慎繼續前进和驕傲自大停滯不前的矛盾。支部又用矛盾必需通过斗争去解决的原理来克服这个矛盾。于是召开了支委扩大会，针对驕傲情緒，展开了思想斗争。會議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的教导，使有驕傲情緒的同志，受到了教育。驕傲轉为謙虛了，这样連队工作又有了新的成績。如果像杨献珍同志所說的，矛盾双方只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話，那末，謙虛和驕傲让它联系在一块，是否可能呢？絕不可能。实际上，不是謙虛战胜驕傲，就是驕傲战胜謙虛，絕不可能只是联系在一块的。如果不进行斗争，驕傲也是不会轉化为謙虛的，而杨献珍同志却片

面強調統一，根本否認鬥爭。這不是一種害人的把戲嗎？這個連隊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強調了在鬥爭中解決矛盾。這樣連隊就進步了，一九六一年評上了四好連隊。但是他們並不滿足，在總評後仍然按照一分為二的方法，繼續找出了連隊的許多薄弱環節，使一九六二年的工作大幅度的上升，終於被評為廣州部队的四好標兵連。一九六三年初，這個連被評為標兵連後，連隊幹部感到榮譽大，壓力重。但是怎樣對待連隊的榮譽呢？這時黨支部又作了分析。認為取得榮譽可能產生驕傲，經過及時的教訓，這個問題還沒有發生就注意預防了。但是在怎樣對待榮譽的問題上，卻出現了另一種矛盾：就是有的幹部為了保持榮譽，對防止事故，採取了一些消極的措施。支部認為這是積極創四好和消極保四好的矛盾。這時，又用思想鬥爭的方法去解決這個矛盾，結果克服了矛盾，使連隊再次評為標兵連。一九六四年這個連隊幹部變化很大，許多人都擔心他們能否繼續創四好。但由於領導上加強了對他們的幫助，並運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協助連隊找出薄弱環節，加以克服。例如：初時連隊幹部信心不足，光看到困難的一方，沒有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去全面分析連隊情況；領導上就幫助他們找出連隊的許多有利條件，也就是找出了事物的對立面，如連隊基礎好，領導幫助多，幹部戰士干劲足等。經過一年的努力鬥爭，就克服了不利因素，連隊各方面的工作比之一九六三年，仍有很大的進步，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更加普遍，而且更有成效了；軍事訓練出現了不少尖子，全連平均成績也比去年上升。這個

連所以能不斷前進，就在於他們按照毛主席關於“一分為二”的指示，去觀察、處理問題，建設連隊。

另外一個也是連續三年的四好連隊，但是一九六四年總評時，沒有評上四好。什麼原因呢？就是不能堅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分析和處理連隊的問題。如過去這個連同標兵連掛了鉤，是向標兵連學習的。去年上半年有的同志說：“我連進步幅度大，現在的問題不是我連學標兵連，而是它學我連了。”確實，領導上總結他們連的經驗也不少，如在這個連開了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介紹了這個連在幹部培養和防止事故等方面的經驗。四好初評時，還被評為團的尖子連隊。為什麼年終總評竟評不上四好呢？原因就是上半年一片贊譽聲中，沒有對這個連的工作作一分為二的分析，很少找出他們存在的薄弱環節。對我們來說，是很深刻的教訓。四好初評以後的一次裝備檢查，這個連落在全團最後，但是連隊幹部卻若无其事，當我們指出他們的缺點時，還不服氣。施工結尾工作落在其它連的後面，他們也不從主觀上找原因，卻說領導給的任務多了。對士兵中出現的一些思想問題，也沒有及時進行思想教育，說是怕影響士兵情緒，所以思想問題越來越多。正由於他們不能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所以就從原來的先進轉化為落後了。楊獻珍同志說到“矛盾的統一，只是說矛盾雙方不可分離地聯繫的意思。”當時他們雖然沒有看到楊獻珍同志的謬論，但在實際上他們卻正是把各種不良傾向和連隊正氣聯繫在一塊，而不是通過鬥爭去解決，結果歪風邪氣就越來越多了。楊獻珍同志說：“學習辦

証法，就是学会把两个对立思想联系在一块的本事”。两种对立思想怎样能联系在一块呢？实质上就是要它們“和平共处”，互不干涉。事实是：不是歪风邪气占上风，就是經過斗争克服歪风邪气，二者是不能长期共存的。难道对歪风邪气还能“求同存异”嗎？显然这是违反辯証法的。毛主席說：“对立的統一是有条件的、暫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則是绝对的。”我們认为，歪风邪气和正气，只有在领导沒有及时发现，或未采取措施时，可以同时存在于連队之中。但这只是暫时的、相对的，如果不斗争，歪风就会占上风；斗争了才能解决矛盾，克服歪风。因此它是不能“只是”联系在一块的。由于这个

連离开了一分为二的辯証法，不进行斗争克服矛盾，結果連队工作落后了。

从上面的情况，完全可以看出杨献珍同志大力宣传“合二而一”的反动思想，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极为不利的。正当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武器，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在思想领域中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大搞革命化的时候，杨献珍同志却更加系統、更加完整地宣扬“合二而一”論，来欺騙群众，取消斗争。这是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坚决批判杨献珍同志的錯誤言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紅旗，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加速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建設。

反对“合二而一”，坚持思想革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战士 萧品科

杨献珍同志宣传“合二而一”論，就是向我們宣传矛盾調和論，抹煞阶级斗争。这种宣传实际上是想毒害我們。我們青年战士要特別提高警惕，防止中毒。如果是警惕性不高，受了他的影响，就会使我們忽視阶级斗争，丧失革命斗志，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杨献珍同志強調說什么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并且說“合二而一”就是“对立統一”，两个对立面只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完全是反馬克思列

宁主义的，这是和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辯証法思想作对。試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怎么能“合”在一起，而不进行斗争呢？帝国主义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怎么能“和平共处”呢？进步的东西和反动的东西怎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呢？新生的东西和腐朽的东西又怎能“合二而一”呢？在我們的脑袋中，怎么能让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合二而一”而不进行斗争呢？我們青年对过去的事知道得少。但在党的教导下，我們完全能看清楚：在

我們國內，被推翻的地、富、反、壞分子和其它反动勢力還在興風作浪，暗里磨刀。所以我們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坚决斗争，直到完全消灭他们为止。一个革命战士对自己也要不断的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不断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清除掉，才能促进思想革命化，当好紅色接班人。在这方面我有一些粗淺的体会：

一九六二年我剛到部队，連长分配我当理发員。“理发員”，我們家乡过去叫作剃头匠。我感到干这行工作不光彩，沒出息。当时，为了服从分配，只好勉强接受这项工作。但干起理发工作来，心里沒有一天是痛快的，总觉得好似低人一等。因此工作不起劲，不認真，技术不好，也不愿意去学。心里有个打算，我干不好，领导就一定会给自己換工作。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工作老是出問題。有时同志們头发长了，叫我理我也不愿意理，理了也是馬馬虎虎的，不是头发剪不齐，就是刮脸刮破皮。后来，連长发现了我的問題，对我进行了教育：“在革命部队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副指導員启发我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两篇文章。学了以后，我認識到，烧木炭的战士张思德，远度重洋、不辞万里而来中国的白求恩大夫，他們为什么这样值得大家尊敬，毛主席为什么要号召我們向他們学习？就是由于他們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他們的脚跟完全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我自己呢？正好是缺乏这些东西。慕虛荣、工作讲价錢的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思想在脑子里占了主要地位。經過了一场思想斗争以后，心里非常慚愧。想到张思德同志烧木炭是为人民服务，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白求恩大夫为了搶救中国阶级兄弟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生命。他們都死得重于泰山。我要象张思德、白求恩同志一样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理发員。因此，我下决心和錯誤的思想分家，不和它“合二而一”，从此以后，我干起理发員的工作来就非常愉快了，为同志們理发感到很光荣，因而虛心学习，努力钻研技术，一有休息時間就给同志們理发，和同志們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思想进步了，技术提高了，年终大家評我当五好战士。以后在首长教育下，我繼續不断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我学习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后，繼續不断的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提高了政治嗅觉，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前，我不愿意穿补丁衣服，羡慕城市生活，见了好吃的就嘴饞，享乐主义相当严重。一九六四年二月份，我跟同志們到广州去执行任务。原先听說要住第一招待所。以后沒去，而到了另一个招待所，心里就很不滿意，一住下就說：这里比不上住第一招待所舒服，在那里是住高樓，用自来水，那多有意思呀！当时，有同志批評我：我們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完成任务的。可是我听了很不順耳。过后，我自己做了深刻的检查，觉得同志們給我提得很对。为什么我总是在舒服不舒服上面兜圈子呢？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享乐思

想的苗头。自己認識到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工作上要永远保持朝气蓬勃，斗志旺盛的精神，在生活上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通过这场思想斗争，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打消了住好地方的念头，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合二而一”，那么我就不但不能进步，而且还会向后退。现在，我还经常开展这方面的思想斗争，生活上处处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阶级觉悟一步一步提高，几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自己的进步和成长，是由于在党和各级首长的培养教导以及同志们热心帮助下，自己能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不断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发扬无产阶级的思想，清除资

产阶级的思想。我现在还有许多缺点，今后永远要坚持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好红色的革命接班人。从许多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坚持四个第一，那么，不论是个人的也好，单位也好，工作就向前发展、进步，战斗力提高。所以我们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组织上，都要经常不断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反对“合二而一”论。杨献珍同志宣扬“合二而一”论，是有意配合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配合修正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是想叫我们忽视阶级斗争，不进行思想改造，放下枪杆子。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中他的毒。我们一定要永远紧握手枪，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坚决革命到底。

一分为二是工人阶级的法宝

广州全新针织厂女工 凌惠款

杨献珍同志宣扬“合二而一”论，引起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这种“合二而一”论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立场，不讲革命，实质上是阶级调和论。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这套“理论”办事，我们的党就要变质，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所以我认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挑战，对革命辩证法的挑战，是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我们必须积极参加这场论战，坚决反对杨献珍同志的谬论。

这样说，是不是说得太重了些呢？不，一点也不重。

我是一个九岁就到资本家厂里做工的女工。在旧社会里，我尝遍了资本家的苦头。资本家成天打的算盘就是挖空心思来压迫和剥削我们工人。当我还是一个童工的时候，每天起早摸黑，辛辛苦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一天连两餐饭都吃不到，只好吃番薯藤、豆腐渣来填满肚子。特别是有一个时期，我的左眼痛得眼泪直流，

也不敢吭声，不敢请假去看病。因为，资本家规定身体不好的不雇，怀了孕的妇女不雇；我怕老板开除，只好拖着病劳动，有苦也说不出来。想想看，这样的人间地狱，工人阶级怎么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呢？如果真的“合二而一”，就没有了革命，就没有了今天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

过去，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不能“合二而一”，是不是今天就可以“合二而一”了呢？当然不可以。我们全新针织厂是由四十多间小厂合并成的，情况很复杂，厂里还有一些资本家、老板娘和四类分子，他们明里暗里向工人阶级进攻，阶级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在前几年，我们的经济生活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有的老板娘就用小恩小惠的办法，有时候拿出一块猪油，有时候拿出一块早点，来拉拢和腐蚀个别思想觉悟不高的工人。有的资本家同个别落后工人一起出去看戏、饮茶和碰杯饮酒，甚至还借出黄色小说给他们看。在这种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个别落后工人就把自己的屁股和资本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替资本家说起话来了，说什么今天的资本家不同于解放前的资本家，他们现在已经和我们一样参加生产，参加劳动，参加工作。于是，个别思想落后的工人，真的在思想上和资本家“合二而一”了，忘记了自己是工人阶级，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忘记了对资本家的监督、改造，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有个资本家竟公开讲起“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话来了，讲起“资本主义始终还是好的”的话来了。看，这是多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是资产阶

级向工人阶级的明目张胆的进攻！请问杨献珍同志，今天工人阶级和资本家怎样才能“合二而一”呢！因此，我们决不能用“合二而一”来处理阶级关系，调和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而只能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处理阶级关系，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才能防止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侵蚀，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阶级关系问题上不能“合二而一”，在生产问题上同样也不能“合二而一”。我们工段新工人多，思想问题不少，生产技术不熟练，曾经出现过产量低、质量差的现象。在去年开始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的时候，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就更为突出。怎么办？是用“合二而一”来掩盖矛盾，还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承认我们工段在生产上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并且找出了这个矛盾的主要根源是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因为，从我们工段里的情况完全可以看出，那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同志，总是具有不断革命的精神，总是想着如何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在生产斗争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断想办法，找窍门，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们的产量不断上升，质量不断提高；而那些思想比较落后的同志，恰恰是怕苦、怕累，认为“自在”好过干劲冲天，认为只要每月照例拿到工资就行了，对于国家规定的产量质量计划却没有放在心眼里。我们不是把这两种思想调和起来“合二而一”，而是组织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文

章，又写学习心得，又开小组会检查自己的思想，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还有些同志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在旧社会里怎样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的苦楚，说明今天的社会主义来得并不容易。大家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都要求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猛追先进，猛赶上海。老工人又利用业余时间耐心帮助新工人掌握操作，熟悉技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工段的生产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由过去平均时产三打四件提高到五打二件，接近上海的先进水平。目前，我们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水平，而是在继续不断地

革命，不断地前进。这个事实就证明了生产中也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经过斗争，矛盾就会转化。因此，我坚决不同意杨献珍同志把矛盾调和起来、不进行揭露、不进行斗争的“合二而一”论。

在现实生活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不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方面，它一用就灵，就是能解决问题，它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法宝”。我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经常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观察事物，来处理问题，提高阶级觉悟，做一个革命化的工人。

（谷南整理）

小农經濟和社会主义工业結合 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嗎？

——評杨献珍同志的“綜合經濟基础論”

吳 俊 光

杨献珍同志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础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即小农經濟）結合为一个整体，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究竟小农經濟能不能和社会主义工业結合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呢？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不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原則問題，是关系到我国社会 发展 前途的根本問題。对于这个問題，历史事实已作了否定的回答，但为了認識杨献珍同志的“理論”的荒謬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践的危害，仍有加以批判的必要。

—

要認識杨献珍同志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理論”的荒謬，且先看一看小农經濟能不能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构成部分。

小农經濟是一种以劳动农民个体劳动和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經濟，它虽然不同于資本主义經濟，但和資本主义經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广闊和极其深厚的資本主义基础”^①，因为“小生产是經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②。关于小农經濟会产生資本主义，即向两极分化的問題，毛泽东同志也曾針对我国土地改革后至农业合作化高潮前的农村情况提出过：“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几年中間，农村中的資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經到处出現，許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許多貧农，則因为生产資料不足，仍然处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③

小农經濟这种不稳定的、会向两极分化的現象，是由小农經濟的性质和 特点 决定的。小农經濟既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經濟，就必然和市场有联系，在生产 and 收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0卷，第89頁。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頁。

③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1頁。

入上受市场的一定支配，他們会幻想通过市场发家致富，所以小农經濟的自发趋向是資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出資本主义經濟来。同时小农經濟又是一种分散的落后的經濟，生产水平低下，經濟力量薄弱，甚至要維持简单再生产也不容易。而随着各戶的劳动力、經營管理和生产情况的不同，彼此之間的經濟条件就会有所差别：有的农民因生产不足而不能自給，不得不向人借貸或当雇工；有的农民因天灾人祸或其他意外事故，无力抗拒，无法解决，陷于飢餓、貧困和破产；而少数較富裕的农民則利用放高利貸、雇工或做投机买卖等办法来剝削其他农民，成为新的富农或投机商人等剝削者。結果，少数人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貧困破产，資本主义自发势力便发展起来。

上述情况，从我国过渡时期初期土地改革后至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以前的农业生产和农村階級变化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

经过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我国农民已从封建地主階級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之下解放出来，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提高，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改善了。但是，个体私有制具有的自发的資本主义傾向，不可避免地使我国当时农村产生两极分化。在广大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处境仍有困难的情况下，土地房屋买卖、土地租佃、借貸、雇工、典青苗、囤粮食、做投机生意等活动，陸續出現，并且逐年增加。例如土地买卖，从中南区35个乡1953年的調查来看，出卖土地的占总农户1—2%，买入土地的占总农户2—3%；在土地买卖中約有一半是貧农因困难而卖地，中农因富裕而买地，在貧农中因困难而卖地的有1.79—3.3%的农户，在中农中因富裕而买地的有2.17%的农户。^①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都有不同程度地发生。

在无产階級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如果任由小农經濟向两极分化，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必然会使工农联盟不能繼續巩固，使工人階級喪失在国家政权中的領導权。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单有国营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劳动人民的个体經濟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階級在国家政权中的領導权。誰要忽視或輕視这一点，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②以后，在1955年，針对着我国当时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的右傾思想，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如果让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現象发展下去，則工农联盟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他說：“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繼續处于貧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决困难。向資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义的道路的話，就永远不能滿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繼續巩固下去嗎？显然是不能夠的。这个問題，只能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

① 見《农村經濟調查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頁。

② 轉引自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載《新华月报》，1959年第11号。

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①

按上所述，如果不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它就越来成为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障碍，从而，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便要受到损害，社会主义建设必然遭到破坏。就是说，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和自发发展，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因此，毫无疑问，小农经济本身根本不能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②，说的正是这个真理。

可见，从小农经济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来看，杨献珍同志要把小农经济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是毫无根据的。

二

小农经济本身不能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么，它能不能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呢？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③他还同时指出，只有在农业已经合作化变为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用或者大量使用社会主义重工业所提供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资料；才能有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农业能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积累必要的资金。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归根到底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技术基础不能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相适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工业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它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不断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是从国家利益和社会需要出发，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并按照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发展的。它的生产规模能够不断地扩大，生产速度能够急剧地增长。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它要求有日益增多的商品粮食与工业

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1—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1482页。

③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2页。

原料，以滿足生产的需要。但是，小农經濟是以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經濟，它的生产关系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分散落后，有一定的盲目性，生产水平低，农作物产量少；它又是商品率极低、多半自給自足的經濟，除个体农民自給外，不能提供很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因而，小农經濟的生产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或者說，小农經濟的商品粮食与工业原料生产水平的低下同社会主义工业对于这些物資日益增长的需要，有着尖銳的矛盾。同时，小农經濟的分散性和一定的盲目性与社会主义工业有計劃的发展，也是互相矛盾的。并且，如我們在本文第一节中所已論述过的，小农經濟自发的資本主义趋向，对于广大农民和工农联盟也是不利的。随着国民經濟的进展，小农經濟与社会主义工业之間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銳；小农經濟繼續存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危害，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在我国过渡时期初期，当第一个五年計劃开始执行的第一年，即1953年，小农經濟与社会主义工业之間的矛盾，便逐漸显露出来。那一年，我国开始进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社会主义工业日益发展，城市与工业人口迅速增加，对于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随之迅速增大，而当时在农村中仍占絕對优势的小农經濟的生产水平，不能适应这种需求，加以当时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粮商的投机捣乱，于是，那年秋收后，在粮食市场上出現了收购困难和供銷不平衡的状况。这种状况正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經濟之間矛盾的一种反映，也反映了国家計劃經濟与小农經濟和自由市场之間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資產階級反限制的資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时由于国家及时实行了粮食的計劃收购和計劃供应，并已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才消除了这种状况。小农經濟与社会主义工业之間的矛盾，也表現于小农經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本来，小农經濟的生产水平已是很低的，1954年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便发生农产原料供应不足的情况，致使1955年消費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只达到1%（生产資料生产为17%），由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棉紗、棉布、卷烟和麻袋这四种产品的减产，就使1955年全国工业增长速度約减低4%。^①事实表明，倘若听任小农經濟繼續存在和自发发展，不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大农业經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就无法前进，社会主义建設就不可能实现。

由此看来，小农經濟和社会主义工业因其依据的生产資料所有制、技术水平以及发展趋向不同，彼此之間有着日益尖銳的矛盾，不能长期并存平衡发展。斯大林曾經对此有过明确的論述，他說：“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內把苏維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經濟基础上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經濟全部崩潰。”^②可是杨献珍同志却硬說斯大林认为个体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結合为一个整体，就是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这不是有意歪曲斯大林的話来裝飾自己的謬

①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5日社論：《积极努力，完成今年的国家計劃》。

②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129頁。着重点是原有的。

論又是什么呢？实际的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小农經濟自发发展破坏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陷于瓦解；或者是小农經濟經過改造，适应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小农經濟和社会主义工业是决不可能“合二而一”，结合起来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如果硬把它們拼在一起，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那就一定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失敗。

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随即积极领导农民群众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对小农經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实现对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經濟基础。

根据上述，从小农經濟和社会主义工业的相互关系来看，杨献珍同志所謂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結合为一个整体，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也是毫无根据的，經不起事实的駁斥的。

三

杨献珍同志把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歪曲为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經濟結合的整体，这正是他的“合二而一”論的具体运用。

如上所述，小农經濟和社会主义工业本来是一对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不可調和的。可是杨献珍同志硬要把未經改造的小农經濟，同社会主义工业拼在一起，調和它們之間的矛盾。

如此“合二而一”，說明了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經濟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尖銳的。稍微放松社会主义的改造，資本主义势力就会泛滥起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間所指出的：“对于农村的陣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領。难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嗎？”^①而杨献珍同志却热衷于维护小农經濟这个資本主义借以滋长的基础，把它作为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构成部分，显然，这在实质上就是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占領农村的陣地，保存小农經濟，发展資本主义。結果，只能是破坏工农联盟，埋葬社会主义事业，建立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城乡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当时农村中的富农和具有資本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富裕中农，要求“发家致富”，要求保护土地买卖、土地租佃、雇工、借貸等“四大自由”，力图发展資本主义。杨献珍同志恰好在这个时期提出小农經濟与社会主义工业相結合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謬論，为資本主义的叫

^① 轉引自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囂搖旗吶喊。這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早在1941年，他在《再論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問題》一文中，就已經公開反對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教導，而主張中國革命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說：“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只是說今天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走不通’，他並沒有籠統的說‘中國革命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反的。他強調的說，‘中國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道路’，這豈不就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么？”^①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在中共中央公布我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後，偏偏要唱出相反的調子。十分清楚，他本來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充當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士，當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社會主義革命一步緊接一步向前發展的時分，他就對住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火，妄圖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半途而廢，把我國社會拉到資本主義的舊軌道上去。

^① 見《人民日報》1964年12月20日。

略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谷 娟

馮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突出強調的三个思想，我认为應該加以批判揭露，并通过批判揭露，找出它們之間的联系，識破其階級实质，看看馮定同志是怎样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而实质上在兜售着資產階級的私貨。

这三个思想是：一曰“活命”，二曰“享乐”，三曰“实干”。

关于第一个思想，馮定同志說：“人如果絲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个人为了大众而牺牲，直至牺牲生命，这并不是經常需要这样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这是什么話？这和現代修正主义者說的“要是丢了脑袋，原則还有什么好处呢？”同出一轍。在現代修正主义者看来，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活命了，沒有了个人的脑袋，个人的利益，什么革命原則都是沒有用处的。因此，苟且偷生，甘当奴隶，总比死去强。馮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宣扬的，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貪生怕死的“活命哲学”。无产階級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在生死观的問題上，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看法。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斗争，推翻一切剝削制度，消灭一切階級，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能使亿万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既然要革命，要斗争，要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么在革命的过程中，死人的事总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說：“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經常发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們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們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册，第316页）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們对待生与死問題的观点是：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一个无产階級革命者，当他活着的时候，應該克尽忠誠地为革命斗争，为人民利益做更多的事；当革命事业、人民的利益需要他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时，他可以做到将个人的利益无条件地、絕對地服从革命利益，甚至毫不犹豫地赴湯蹈火，做出“以小我完成大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来。可見，馬克思主义者对生与死的态度，同馮定同志說的是完全不同的。馮定同志的原則是活命第一，脑袋第一，除此以外什么革命的原則，什么人民的利益，都可以不要了。

而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則是革命第一，人民利益第一；當人民的利益需要他犧牲個人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時，也在所不惜。對於這種偉大的崇高的自我犧牲的壯烈行為，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是把它看作是无上的光榮和驕傲，因為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終如一地履行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光榮任務，甚至在一定的意義上講，也只有這種英雄的自我犧牲的壯烈行為才能做到為人民服務。毛主席說：“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下冊，第315頁）即使為了革命事業的需要，個人犧牲了，但是群眾卻仍然在堅持鬥爭，並不是個人一死就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來。個人為了革命事業而犧牲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只有貪生怕死之徒，才為了保存自己的腦袋而甘當奴隸。“與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這正是革命者的豪言壯語。為了活命而甘當奴隸、叛徒，是最可恥的。當然，我們也不是說每個人非犧牲不可，也從不主張作無謂的犧牲。無產階級搞革命，在戰略上總是要以最小的犧牲取得最大的勝利。但是作為革命者個人來說，則必須時刻準備着當革命事業需要的時候，能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生命。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作為革命者的個人乃是整個革命事業肌體中的一個細胞，是不能夠把個人從整個革命事業割裂開來、孤立起來，而光從“個人的角度”來觀察生與死的問題的。馮定同志還說：“在一般情況下，只有個人首先活着才能為大眾服務”。這同樣是荒謬的。既然“在一般的情況下”，即在日常的活動中，處處都以個人的“活命哲學”作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指南，怎麼可能設想“在特殊的情況下”，即在人民事業需要你犧牲自己的緊急關頭，會毅然地放棄“活命哲學”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呢？須知，任何背叛革命的可恥行徑，都不是偶然的；任何叛徒背叛革命事業，都可以在他以前的歷史中找到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可見，在“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犧牲並不是經常需要這樣做的”，“在一般的情況下，只有個人首先活着才能為大眾服務”的煙幕下，販賣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活命哲學”，正是馮定同志的“活命哲學”的特點。

關於第二個思想，馮定同志說：“人總是希望幸福的。”那麼要什麼樣的幸福呢？他說：“如果幸福說的是指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只有和平，沒有戰爭，吃的好，穿的美，住的寬敞干淨，夫妻父母子女親愛和睦，這無疑是對的，也是我們大家在所求的”。這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決不是無產階級的幸福觀。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人只有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獻身於推翻剝削制度，消滅階級的偉大革命鬥爭，為本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而奮鬥終身，才是最大的幸福。馬克思有句名言：

“鬥爭就是幸福”，說的正是這個意思。當然，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定一個人需要有一定的物質生活，因為人要活下去，總得要吃飯，要穿衣，要住房子。但是，把個人的吃好、穿好、住好等等，當作個人追求的“幸福”，當作個人奮鬥目標，把它放在革命利益之上，那就錯了。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只有全體勞動人民的解放，才有無產階級本身的解放；只有全世界一切無產者、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才有本國無產者和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把幸福歸結為吃好穿好等物質生活，是資產階級的观点，而不

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垂死的资产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因此，他们总是追求吃、喝、玩、乐的腐烂生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幸福。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样，中国劳动人民就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始过着幸福的生活。由于旧中国经济非常落后，所以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还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革命作风，因为对于我国无产者和全体劳动人民来说，现在还有双重的任务压在我们肩上：首先是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未根本改变，人民的生活还要继续改善、提高，特别是要在我们国家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还需要经过五代、十代人的艰辛奋斗。毛主席说：“要使全体青年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其次，我们还应该想到全世界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迫切要求解放，他们迫切地要求已经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援。因此，在目前条件下，片面强调吃好、穿好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极为有害的；它是瓦解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的一付毒剂。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幸福观，乃是同革命斗争、同艰苦奋斗、同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幸福观，我们不能脱离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离开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而孤立地谈个人的吃好、穿好、住好的问题，否则就会成为鼠目寸光，成天为个人的吃、喝、玩、乐而打算盘的庸人。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幸福观，同冯定同志所宣扬的幸福观，乃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幸福观，即无产阶级的幸福观与资产阶级的幸福观。在资产阶级看来，最幸福的东西乃是骑在无产阶级的头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却是最大的痛苦。资产阶级宣扬其腐朽的生活方式，乃是他们企图实行和平演变的一种最毒辣的手段。如果按照冯定同志的幸福观，那么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谈不上什么“幸福”了，而那些吃饱喝足、对劳动人民实行巧取豪夺的剥削者反而算是“幸福”的了。这显然是对幸福问题的极大歪曲。因此，离开革命，离开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去谈什么过好日子，是假共产主义在幸福观问题上的体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他的第三个思想，即所谓“实干”问题。他说：“空想做人是无益的。一个是空想而不实干，一个是实干而不空想，二者相比，那么后者就要优越得多。比如工人、农民和广大的劳动者，当他们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虽其思想并不一定远大，然而他们的实干，他们的切切实实的劳动，正好就是连绵不断的人类历史的基础。”这段话表面看来，好象还说“头头是道”，而且还说什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这是誰都多少有些知道的”，但是他笔鋒一轉，就露出了自己的馬脚：“許多劳动模范，首先正是因为能够踏实工作，这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成就的。”还說：“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有的立志要爭取某些学位、学衔是必要的，是值得嘉勉的”。你看，他說得多明白，多肯定。原来“实干”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就是为了“成名成家”。既然把“实干”、“踏实工作”的思想落实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那么所謂“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法，也就必然成为他所要反对的“空想”了。可見，馮定同志所說的“实干”，并不是为了革命而踏踏实实地劳动，而是为了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吃得好、穿得好而卖命罢了。这正是鼓吹人們去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老路。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把为了“出人头地”的“实干”套在許多劳动模范身上。这是对許多劳动模范的污蔑！我国許多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深刻地指出：馮定同志的这种說法，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借口“实干”，来否定、取消无产階級政治挂帅的重要性。然而，对于馮定同志說来，可悲的是劳动模范們所理解的实干，同馮定同志所說的“实干”是根本不同的。劳动模范們說：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灵魂是思想革命；不懂得为谁劳动，就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劳动，也就不能搞什么革新。而不是象馮定同志說的那种不要党的领导，不要革命理想、不要政治挂帅的“埋头干活”。当然，馮定同志从資產階級的世界观出发而强加在我們国家的許多劳动模范身上的污蔑，絲毫无損于他們的“脚踩污泥、胸怀天下”的高貴品质。

我們只要以階級和階級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所謂“实干”一詞的含义，就会发现这中間也不能不盖上階級的烙印：有从資產階級世界观出发的个人主义的所謂“实干”，也有从无产階級世界观出发的集体主义的“实干”。一事当头，只想到“我”字，見利而趋，“踏实工作”，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思想的表現；而集体主义的“实干”精神，則只能是把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目的完全溶化在階級的、党的、人民的利益和目的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要你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刘少奇同志在《論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教导我們：“我們的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党的利益和党的发展而奋斗，并且應該把党的、階級的成功和胜利，看作自己的成功和胜利。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但是，只能在爭取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中，来提高这种能力，增加这种本领，不能够离开党的事业和发展而去爭取什么个人的独立发展。事实也証明，党员只有全心全意地爭取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本领，否則，党员要进步、要提高，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无产階級革命者，所有革命青年，都应当以这样的原則来看待“实干”精神、“实干”本领，来处理政治与业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問題。离开这样的原則，單純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而去“踏实工作”，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馮定同志說的“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有的立志要爭取某些学位、学衔是必要的，是值得嘉勉的”，显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场，鼓励青年人走只专不紅的道路。青年人如果按照馮定同志說的为爭“学位”而“向科学进军”，也必将

最后演变成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馮定同志說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实干”精神、“实干”道路，乃是死胡同，乃是可怕的陷阱。革命的知識分子、青年，必須坚决反对馮定同志所鼓吹的这条道路。

我們从上面的簡略分析，可以看到：貫串在“活命”、“享乐”、“实干”这三者之間的一根黑綫，就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出发，当然就会首先想到自己的“活命”問題。为了“活命”，所以他想出一套个人主义的“合法論”，为自己的“活命哲学”辯护。所謂“人如果絲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不易搞通的”，就是他的“活命哲学”的“理論”前提。他从这样的“理論”前提出发，又提出所謂活得好，活得舒服的“标准”，这就是前面已經揭露过的馮定同志的享乐主义和“幸福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指出：“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說法。至于他們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終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89頁）馮定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根本不管我們今天的社会制度同資本主义社会相比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硬把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塞进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来；还就如何才能活得好，活得“出人头地”問題，勾画了一幅蓝图，这就是他說的埋头埋腦地、不要革命理想、不要党的領導，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实干”。这充分表明了他是多么頑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在馮定同志看来，“活命”，是人生大前提；“享乐”、“出人头地”……乃是“活命”的实际内容；而达到“享乐”、“出人头地”的具体途径則是不問政治的“实干”。馮定同志宣扬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一个完整的、反动的思想体系，这种完整的、反动的思想体系不是別的，乃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是“不朽的”，还是腐朽的？

——对馮定的《革命的人生是不朽的》一文的批判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战士 李家喜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伟大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感动了每一个革命青年的心。“怎样做人，为谁活着”，雷锋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雷锋同志的革命精神，发出了灿烂的光芒，激励着我们青年人坚决走革命化的道路，决心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馮定同志借题发挥，挂着学习雷锋之名，大肆宣扬他的所谓“革命人生观”。实际上是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青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青年革命化，帮助资产阶级与党争夺年青一代。在这方面，馮定同志写了很多文章，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革命的人生是不朽的——学习雷锋的关键》就是其中一篇。在这篇文章里，馮定同志表面上说的是要树立“不朽的”“革命的人生观”，实际上是宣扬他的那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下面就是我对馮定同志这篇文章的几点意见。

一、撇开人的阶级性，空谈人的本质。“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吃饭”，这是馮定同志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而抽象地提出来的两个问题。同时，馮定同志也离开人的阶级性，用抽象的人性论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他说，人“是会劳动，能思维的，既有物质生活，更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因而活着只是为了吃饭，就失去了做人的本质意义”。换句话说，只要是“人”，就一定是“吃饭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那么一切剥削阶级也不会是“活着为了吃饭”，因为他们也是人啊！这样一来，按照馮定同志的意见，不管是那个阶级的人，就在“活着为了吃饭”这个据说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合二而一”，走入了“无差别境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自从人类社会划分阶级以来，人，从来就是作为特定的阶级的人存在的，他们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一切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看法。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阶级本质，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阶级本质，除此再无别的共同本质了。但是馮定同志却把“会劳动、能思维的，既有物质生活，更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当成人人的“共同本质”。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吗？我们知道，历来的剥削阶级，总是不劳而获，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蔑视劳动，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他们从小就受着劳动锻炼，养成了劳动习惯，具有勤劳的本色，他们爱劳动，也只有他们才会劳动。对待精神生活和物质

生活，情形也无不如此。誠然，作为人是需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但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呢？资产階級說，他們需要的是揮金如土，驕奢淫逸，享乐腐化；而在无产階級看来，这是十分可鄙的。他們胸怀全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們需要的是艰苦朴素，是革命的战斗的生活。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但是馮定同志却有意抹煞階級界限，向青年販賣资产階級人性論，和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唱对台戏。

二、宣扬庸人理想、活命哲学。什么是革命青年的远大理想呢？我們的回答是，也只能是为了彻底解放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实现沒有帝国主义、沒有資本主义、沒有剝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應該立足于自己的崗位，胸怀全球。馮定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尽管也談了要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但这只不过是作为掩飾的外衣，他骨子里是要我們接受“吃飯——活着——吃飯”这一所謂“崇高”理想的。这是对雷鋒同志的伟大的理想的歪曲。雷鋒同志說：“我們吃飯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飯。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伟大的抱負。可是，馮定同志断章取义地只要了这段話的“我們吃飯是为了活着”这半句話，而却把这段話的精华抛弃了。并抓住这几个字，而加以大吹特吹，說什么这样就“实际上已經解决了人生的根本問題”。那么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他故弄玄虛的說什么要从經濟、政治、思想方面来解决这个問題。他說：“經濟問題主要就是吃飯問題，但是，只有考虑的不是仅仅个人的吃飯問題，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吃飯問題，以至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子孙孙吃飯的問題，做人才有远大的理想，才有崇高的目标。”这就是說，經過轉弯抹角以后，又把这个“活着为了吃飯”的“崇高”理想端了出来，不同的就是加上了要为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子孙孙的吃飯問題。这和修正主义的“好死不如賴活着”的活命哲学，有什么两样呢？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是謀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馮定同志大讲崇高理想，却不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劳动观点，而要我們为了“解决吃飯問題”而劳动。馮定同志虽然說什么要站在階級斗争前綫，但也只是为了解决吃飯問題，絲毫不提世界革命的任务。要知道，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是根本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所以离开了革命，离开了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是假共产主义者。雷鋒同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时刻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解放，并为他們的解放而努力工作。然而馮定同志在給我們談共产主义革命世界观时，却閉口不談革命斗争，而翻来复去的讲“吃飯——活着——吃飯”的庸人理想。这不是有意腐蝕青年的革命理想，磨灭青年的革命意志嗎？

三、否認思想改造，宣扬自发形成共产主义人生观。我們知道，雷鋒同志之所以能从一个旧社会的孤儿，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階級革命战士，关键在于他能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認真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馮定同志这篇文

章，据說是要告訴我們一个“学习雷鋒的关键”，理应是談一些雷鋒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觀的經驗。然而馮定同志避开这些不談，而要我們按照他画的圈圈去“实践”，去鍛煉，去体会：“如象爱好劳动，亲近工农，遵守公共紀律，爱护公共財產，在钻研业务中也时时关心社会主义的建設事业和国际、国内的階級斗争形势，以至就学、就业也都是从社会的需要来考虑等等；这样，就漸漸会养成习惯，胸襟豁达了，志向高尚了，立场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定了，遇事就会不必經過痛苦的思想斗争，……革命的世界觀也就自然而然扎下了根，而且会巩固起来了。”显然这絕不是什么学习雷鋒的关键，而是有意抹煞毛泽东思想对雷鋒同志的成长的作用，企图把青年引入歧途。这是十足的謬論。首先这段話在認識来源的問題上违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認識論的原理。毛主席說：“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階級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实践中来。”“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馮定同志也讲到实践，但是，他所說的实践是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实践”。他叫青年不用参加火热的斗争，只要站在斗争之外，“关心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国际、国内的階級斗争形势”，就可以使立场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定。这岂不是要人相信，一不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毛泽东著作；二不用参加三大社会实践，就可以有正确的思想嗎？其次，否认思想改造，宣扬自发形成共产主义人生观。毛主席說：“在階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斗争，資产階級思想和无产階級思想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不破不立，不消除資产階級思想，就不能树立无产階級思想。怎么能說，不用經過深刻的思想改造，就能使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成为“习惯”，就能保證不被資产階級世界觀所侵蝕呢？第三，馮定同志还說，共产主义世界觀一旦成为习惯，就不用“使精神时常处在自我斗争的紧张状态中”，“遇事不必經過痛苦的思想斗争”，“革命的世界觀也就自然而然扎下了根，而且会巩固起来了。”这同样是騙人的鬼話。毛主席說：“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錯誤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錯誤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結。”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的認識如果不能在斗争中发展，就会不符合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实践，就必然要犯錯誤，甚至走上反动的道路。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是有些人曾經是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曾經为革命作了一些好事；但后来，由于放松了革命警惕，忘記了階級斗争，結果被資产階級的糖衣炮弹击中，被資产階級的思想所腐蝕，原来的一点革命精神不但沒有“自然而然”的扎下根，反而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嗎？所以我們必須經常学习毛泽东思想，参加階級斗争，和工农群众相結合，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才能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世界觀。

四 否認階級斗争，宣扬階級調和。这篇文章虽然也在个别地方言不由衷地喊了几句“階級斗争”，但在所有的具体問題上都是否定階級斗争的，在談到青年树立世界觀

的問題上忽視思想改造就是一例。我們還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比如，在評價雷鋒的實踐時，只肯定他的勞動觀點和群眾觀點，而不提他的鮮明的階級觀點。誰都知道，雷鋒同志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他時刻不忘的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解放，他“對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象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等等，這是雷鋒同志一生言行的真實寫照。所以周總理在題詞中，把學習雷鋒同志的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放在首要地位。可見雷鋒的階級觀點是非常明確的。但是，馮定同志在這篇文章里運用“巧妙”的手法，傳播階級調和論的觀點。一方面抽象地肯定階級本性是不可改變的，一方面又說“整個階級和一個一個的階級成員”是不同的。“對個人（剝削階級的個人——引者）來說，只要不是反動階級的政治代表或思想代表，沒有頑固不化的整套反動理論和根深柢固的反動世界觀，那麼擺脫舊習慣舊影響的束縛，主動來接受真理……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說，把階級敵人局限在十分狹小的範圍內，而對反動階級的絕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對革命的反抗不是由於階級本性，而是由於受舊習慣舊影響的束縛，這種束縛是可以通过主動接受真理而擺脫的。這不就是說我們和這些人並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鬥爭嗎？當然反動階級的人，在生理條件以及其他許多方面是存在着千差萬別的，但是他們的階級本質却是共同的，如果地主不剝削壓迫農民，他怎麼又會成為地主呢？決定一個人對待革命的態度的，不是他的生理特點等等，恰恰是其階級本質。毛主席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怎麼能夠說，除反動階級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表以外的一切剝削階級的“個人”，都可以主動接受真理，而不用和他們鬥爭呢？還有，馮定同志把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簡單的用“新生力量和衰朽力量”的鬥爭來代替；在談到某些青年墮落以至不可救藥時，不把它看成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而說什麼受“壞人誘惑”等等，抽去人的階級性而籠統稱之為“好人”“壞人”。總之，在馮定同志的觀點里，階級不見了，階級鬥爭也不見了。但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生活也一再証實了這一論斷的無比正確性。那麼馮定同志為什麼象害怕瘟疫一樣害怕階級和階級鬥爭呢？這只能是因為青年一旦掌握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學會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就會識破一切敵人的陰謀詭計，不管是化裝成美女的敵人，還是面目猙獰的敵人，或者是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的敵人，都逃不脫他們的“火眼金睛”。敵人的“和平演變”陰謀也就會徹底破產。

歷史永遠是按照既定的規律發展的，共產主義一定會在全世界獲勝。中國青年正在以雷鋒為榜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高舉革命的大旗，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任何人都不能阻擋我們青年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

生产价格論是资产阶级的經濟主張

广州重型机器厂 張維靜

近来我国报刊上，展开了对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問題的討論。这一个問題的爭論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經濟学上的反映，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問題，不仅經濟学界有重視的必要，經濟工作人員，亦應該充分重視。我想从以下几点来談一談。

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的經濟范畴

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是資本主义的經濟范畴，而不是什么社会化大規模經濟共有的經濟范畴。因为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价值規律和剩余价值規律在起着調节生产，調节流通的作用，那一部門投資少，生产少，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利潤增多，資本就涌向那一部門；反之，那一部門投資太多，生产过剩，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潤减少，資本就轉移。資本家就是这样通过竞争和对利潤的追逐，实现利潤的平均化。生产价格就是在資本自由轉移的条件下在竞争中自发地形成的。也只有形成生产价格，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資本主义才能按比例实现社会再生产。但是这个按比例是要經過资产阶级內部斗争和比例失調——經濟危机——来实现的。

社会主义經濟是計劃經濟，既沒有自由竞争，也不可能有資金的自由轉移，每一計劃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根据社会需要和国家的政治經濟任务来統一規定，决不是、也不應該是根據什么投資效果，或資金利潤率来决定。价值規律只是被利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不可能起調节生产的作用。而剩余价值規律則已經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就不可能形成什么生产价格、平均利潤等經濟范畴。杨坚白等同志把資本主义特有的經濟范畴，硬塞到社会主义經濟中来，是非常錯誤的。

二、所謂“公平合理”乃是資本主义的原則

我們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品价格，大致上是根据同类产品的平均成本加同类产品的計劃利潤再加稅金制訂出来，所謂同类产品的平均成本，就是根据制造同类产品的工业企业大多数能够达到的成本水平。計劃利潤，則是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經濟任务和方針政策，按不同产品分別規定的利潤率計算出来的。一般來說，重工业产品的利潤比輕工业低一些；支援农业产品的利潤又比一般产品的利潤低一些。稅金高低，对产品的价格有一定影响，国家亦根据上述原則，按不同类产品，規定不同的稅率。总之，国家对于工业产品价格，一般是根据下面几个原則制訂的：一、

照顾同类产品多数成本水平，促进生产发展；二、贯彻国民经济建设有关方针政策；三、要有利于企业经济核算，要保证合理的积累和有利于物资交流；四、贯彻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原则；五、要考虑合理比价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安定人民生活。

解放以来，我国工业产品都是根据这些原则来制订的，但不同企业之间，从来没有因为产品价格高低和利润大小，而发生过什么“公平合理”与否的问题，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并不以利润多少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而是以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为衡量标准的。如我们重型机器厂，资金盈利率虽然低一些，但国家规定的指标全面完成了，我们同样感到光荣，这中间也丝毫不存在轻工业部门占了我们的“便宜”问题。国家对我厂的投资大小，并不根据我厂的利润多少来决定，而是根据国家（社会）需要来决定；同时，资金盈利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和企业，也并不感到国家对他们投资少一些，而有什么“不公平”之感。因为我们的企业，既不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的企业，也不是集团所有制的企业，而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杨坚白等同志捏造出一套什么“公平合理”、“不公平合理”的理论，显然是以资本主义的原则来衡量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是完全错误的。

三、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指标 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管理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并不是根据杨坚白等同志所说的用平均资金利润率来衡量，而是根据下

列的各项指标是否全面完成来衡量的。这些指标是：

一、产品产值，主要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指标。

二、新产品试制计划指标。

三、年末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

四、产品成本降低指标。

五、计划利润指标。

六、定额流动资金周转期指标。

企业只有全面完成上述指标，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保证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充分和合理的利用，才能保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得到正确的贯彻。如果按照杨坚白等同志所说的那样，以平均利润率来衡量企业经营的好坏，就会产生如下的后果：

一、引导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有利可图的产品就千方百计地增产，利润少或没有利润的产品，就不感兴趣，不想办法去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就不能全面完成。这样，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所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就会蜕化而变成资本主义经济。

二、必然使国家对工业建设投资以利润大小为主要根据。在重工业一般利润较少的情况下，发展重工业的计划就被取消了；在支援农业的产品利润较少的情况下，“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也被取消了；在一般的情况下，大型企业利润较大，洋法生产利润较大，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土

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也被取消了。

三、企业生产以利润为目的，必然要使企业的利润和职工个人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而以物质刺激作为发挥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唯一动力。这样一来，政治挂帅就被取消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就被忘记了，那末就谈不上发挥职工的真正社会主义积极性。

由此可见，根据杨坚白等同志的主张来办企业，我们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计划利润指标，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来说，是不是无关重要的呢？

不，它虽然不是我们生产和投资的目的，也不是衡量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资效果的主要指标，但是它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仍要努力去完成这个指标。可是，第一，不能用提高产品价格的办法；第二，不能弄虚作假；第三，不能偷工减料，不顾质量；第四，不能只顾完成利润多的产品，而不去完成利润少或没有利润而国家（社会）需要的产品。必须在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指标的基础上，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通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降低产品成本来完成。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驳生产价格论者的一个论点

广州氮肥厂 陈宝株

杨坚白和何建章等同志从资本主义社会等量资金获得等量利润的观点出发，提出要用生产价格来订价，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以占用资金量来分配社会盈利。他们说什么“国家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这些投资实现后会增加多少生产能力，增加多少产品，而且要考虑投资实现后将为国家提供多少积累，来满足社会长远的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国家投资额较大的部门，能够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每一个部门，应当在自己的正常生产经营中，为本身的不断扩大再生产创造资金来源。”（见《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第15页）按我们的理解，他们实际上

认为：占用国家资金多的部门、企业应当多缴利润，占用国家资金少的部门、企业应当少缴利润；上缴利润高于资金平均利润率的部门、企业，由于积累多，它得到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也就多，就可以得到优先发展；上缴利润低于资金平均利润率的部门、企业，由于积累少，它得到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就少，发展也就会慢；那些经营亏本产品的部门、企业只好不发展，或者关门大吉。这样一来，资金利润率便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生产的指导思想，也成为考核部门、企业经营好坏的唯一标准了。

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是希望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采纳运用的。可是，我认为决不能采纳他们这种主张，而应予以批

駁。就广州氮肥厂來說，它的第一期工程已投产一年多，生产和完成国家計劃的情况在同行业中評比也不落后。假設它今年能生产十万吨氮肥（实际不止此数），用于支援农业就可以增产四十万吨粮食，社会經济效果确实是不錯的。但用生产价格論者的論点来衡量，那就适得其反。因为它占用国家資金多，仅第一期工程就用去国家投資数千万元，而它的产品按国家統一价格銷售，資金利潤率是很低的。根据1964年的情况粗略的計算了一下，資金利潤率只达3%左右，积累是很少的。我国近几年来，象广州氮肥厂这样大型的氮肥厂建設得不少，需用資金量巨大。很明显，仅靠氮肥行业本身的积累是不行的。今后仅靠氮肥行业本身的积累来发展氮肥工业，也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如按生产价格論者的要求，各部門在自己正常的生产經营中，为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創造資金来源，这便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是按照取得平均利潤率的观点，提高产品出厂价格，牟取較高利潤，来取得扩大再生产的資金呢？还是按照国家現行統一价格出售产品，从国民經济总积累中取得扩大再生产的資金呢？这确实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只要生产价格論者还承认社会主义計劃經济，还承认工业应当支援农业，他們的主张肯定是走不通的。为什么呢？

第一，如果在氮肥行业采用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就得把氮肥价格提高。当然，我国幅員广闊，化肥的需要量很大，将氮肥价格提高也不愁无法銷售。但这是与国家价格政策背道而馳的。从当前国家价格政策来看氮肥价格，氮肥产品的利潤不是低而是高了。伴随着生产发展，今后

还要繼續压低，以便更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违背这个政策，工农业产品差价将会愈来愈大，而农业化学化、工业支援农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等方針政策，都将变成一句空話。发展下去，作为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也将受到影响。

第二，目前氮肥行业大兴社会主义协作之风，一厂有困难，大家都支援；在企业管理、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試制等方面互相“传經”、“送宝”，一厂的先进經驗可以推广全国。若以資金利潤率来考核企业，大家都要維持自己高額利潤，这种协作之风必将破坏无遺。問題还不止于此。如仅以資金利潤率来考核企业，企业領導者就不用去考虑既要完成生产任务，又要完成国家計劃各种指标的問題，哪一种产品利潤高就生产哪一种。譬如在氮肥厂，把合成氨加工成氨水比加工成硫酸氨賺錢多，配合合成氨生产的硫酸单独作商品出售賺錢更多。假設改变氮肥生产方向，把合成氨加工成其他东西則更为賺錢。如果全国各氮肥厂都这样办，必将出現某些产品过剩、某些产品不足的局面，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还有什么差別呢？用这种办法能否为氮肥行业夺取更大的利潤和积累，是无把握的，只能决定于竞争！如果把生产价格論者主张的办法推广应用于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各个企业，則各部門、各地区、各企业之間互爭利潤的局面也无法避免，从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也将演变成集团所有或地区所有，这岂不是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經济全部解体嗎？因此，对于生产价格論这种“理論”，我們必須严加批駁，决不能上他們的当。

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

华南縫紉机厂 伍 旭

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所謂“生产价格”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产品的出厂价格应以成本加平均資金利潤为标准，并要以資金利潤率作为评价企业經營管理水平的标准。这种主张，是很錯誤的。

“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都是以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在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竞争过程中形成的。我們社会主义企业，根本沒有竞争，它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部門之間、企业之間的关系，是相互开展比学赶帮，相互协作，相互支援的关系，因此根本不需要什么以生产价格訂价，共同按資金瓜分社会总剩余产品价值，以資金利潤率来评价各部門、各企业經營管理水平这一套办法。

关于评价企业經營管理水平的标准問題，我們且不說以資金利潤率来作为不同部門之間、不同企业之間經營管理水平的标准行不通，就是用它来作为评价同一个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的标准也行不通，因为这会給企业的經營管理工作作出錯誤的评价，对生产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以我們华南縫紉机厂的实际情况为例：如果按資金利潤率，1964年比1960年低18.84%。

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观点，那么，1964年我厂的經營管理水平比1960年差了，向后退了。但事实并非这样。我厂的經營管理水平和职工的階級覺悟，是一年比一年提高的。1964年是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计划，与1960年比較，产量增长了34.6%；质量（部頒标准項目达到率）以1964年达到的水平計，比1960年提高42.86%；全員劳动生产率提高8.48%；全部职工平均人数，减少17.03%；成本以JA2—2三斗摺式家用縫紉机計算，1964年比1960年下降8.63%。很明显，1964年比1960年产量多，生产快，质量好，成本低。优质高产，低消耗，增产不增人，还减少了人，显然1964年的經營管理水平比1960年提高了。可見即使就同一个企业來說，也不能把資金利潤率当作标准片面去评价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因为資金的有机构成（我厂資金的有机构成1964年比1960年高9.68%）和出产的产品品种（1960年我厂计划主要生产工业用縫紉机較多，利潤大）等客观情况前后不同，以資金利潤率来评价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根本是不可比的，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评价企业經營管理工作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生产以滿足社会需要为目

的，而不是以賺錢为目的。这是遵循毛主席关于“发展經濟，保障供給”这个指示办事的，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所謂滿足社会需要，要求企业在国家統一計劃下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品种規格齐全，质量优良，数量多，成本低，同时还要增加企业的盈利，以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因此，要評價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在經濟效果方面，首先就要評價企业是否按产品品种、质量、数量、劳动生产率、工資总额、流动資金、成本、利潤等指标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計劃来满足社会需要，决不是以資金利潤率作为評價企业的标准。如果以資金利潤率作为評價的标准，这就变成以賺錢为企业的生产目的，以賺錢作为企业的根本任务和管理原則了。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不允許的。虽然企业必須在国家統一計劃下，通过貫徹勤儉办企业的方針，節約一厘錢的精神，和通过增产等办法来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完成和超額完成上繳利潤的任务，扩大社会主义积累，但这决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

那末，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应按照什么原則来評價企业的經營管理水平呢？根据建国十五年来在工业交通部門評價企业管理工作的經驗，只能根据党的政策，按照“五好”标准来評價。“五好”标准就是：

（一）政治工作好：一切工作要政治挂帅，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三面紅旗，正确执行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和国家法令，坚决貫徹勤儉办企业的方針，做好活的思想工作，以階級斗争为綱，以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

条道路斗争为綱，經常向职工进行階級教育，不断提高职工的階級覺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計劃完成好：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計劃，包括产品品种、质量、数量、劳动生产率、工資总额、成本、流动資金、利潤等全面的主要計劃指标。当前以质量为中心，要求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三）企业管理好：就是要貫徹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負責制、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結合”制度，做好計劃、生产、技术、物资、劳动、财务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把科学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結合，做好經濟核算工作，保証安全生产等。

（四）生活管理好：就是关心职工生活，职工食堂和其他集体福利事业办得好，集体宿舍管得好，家属工作做得好，文明生产工作搞得好，計划生育提倡得好，文娱体育活动好等。

（五）干部作风好：就是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經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钻研技术、业务等。

我們的做法是：“一好（政治工作好）帶四好”，“四好为一好（完成計劃好）”。“一好帶四好”，就是說首先要政治工作好，以政治为統帥，为灵魂，来帶動其它四好。“四好为一好”，就是說要通过政治工作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和干部作风好，达到計劃完成好的目的。我們必須坚决按照党的要求，以“五好”来評價企业管理工作，才能正确地把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結合起来。坚持政治挂

帥，才能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才能使社會主義企業成為革命化和現代化的先進企業。

從上面所述，可見在如何評價企業的經營管理這個問題上，楊堅白等同志的主張同黨的方針政策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以“五好”為標準，是主張政治掛帥的；楊堅白

等同志主張以生產價格訂價，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標準，則是要求“利潤掛帥”，這不過是以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改革”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此，我們必須對他們的一套主張進行深入的批判，和他們劃清思想界限。

生產價格論是要取消黨的 價格政策的謬論

廣州市計委物價處 梁之良 唐 崧

最近，我國經濟學界正就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形成的基礎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楊堅白、何建章等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形成的基礎是生產價格。我們不同意這種意見。如果按照這樣的主張去制訂價格，實際是從根本上取消社會主義的計劃價格，取消黨的價格政策，把社會主義價格形成引導到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軌道上去。

我們物價機關制訂各種產品的價格，應該是大體上符合它本身的價值，使各生產部門在正常生產的情況下，能夠收回成本，並得到適當的盈利，以保證能夠擴大再生產。這是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因此我們在制訂價格時主要考慮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生產成本，二是盈利。生產成本部分具有比較確切的依據，似乎沒有很多的爭論，問題的焦點在於盈利部分應如何確定。如果按生產價格論者的主張，占用同等的資金要獲得同等的盈利，各個部門

的盈利要按照全社會的平均資金利潤率來確定，這樣，各種產品盈利的大小從而價格水平的高低，是由占用資金的多少決定的。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各種產品盈利的大小以及價格的高低，是由國家根據政策的要求決定的，不僅各部門之間的盈利應該有所不同，同一部門不同產品的盈利也是各別的。有的產品盈利大些，有的小些，有的無利甚至有的實行政策性虧損，這裡從來不存在什麼平均利潤率，更不存在平均資金利潤率。因為物價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它牽涉到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關係到國家、集體和個人各方面利益的正確處理。譬如生產資料和一般消費資料、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在盈利的掌握上是不能一概而論的。這就是我們制訂價格時，既要考慮大體上符合其本身價值，即考慮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又不能以此簡單地規定物價的道理。只有這樣才能貫徹“發展經濟，保障

供給”的总方針。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張恰恰是无需考虑国家政策对不同产品的不同要求，制訂价格时，只要在成本的基础上，打上平均資金利潤率，将計算机一搖便可以了，还有什么政策可說呢？哪里談得上通过有計劃的制定价格来促进国民經济的发展呢？

現在我們仅从物价工作的角度談談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張，会給社会主义經济带来些什么害处。

一、生产价格必然导致生产資料的涨价，不利于国民經济各部門实现技术改造

我国的生产資料工业（主要是重工业），担负着对国民經济各部門提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任务，因此，正确地訂定生产資料价格对促进国民經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由于生产資料生产部門資金有机构成較高，占用資金較多，目前以資金利潤率計算，它比輕工业的低，我們暫且假定：

类 別	資金总额	盈利总额	資金利潤率
生产資料	60,000元	6,000元	10%
生活資料	40,000元	12,000元	30%
合 計	100,000元	18,000元	18%

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張訂价，生产資料产品的資金利潤率将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八，这意味着生产資料价格要在現有水平上全面涨价；而生活資料的資金利潤率将由百分之三十降为百分之十八，其价格水平将要下降。由于設備提价而部分地增大了生活資料生产部門的成本，其必然的趋势仍然是生产資料价格涨得多，生活資料价格降得少。我們知道，生产資料的

供应对象是国民經济各部門，生产資料价高利大，結果会怎么样呢？第一，将要增大生产資料生产部門的盈利。这从国家整体看来得不到任何好处，因为这种增大了的盈利，不过是从其他部門轉过来的，从总体上看，积累并没有增大。从其他部門看来，却不利于技术改造，不利于經济核算，并且还会出现一联串的連鎖反应。比如由于机械工业产品提价，电力工业产品也要提价，利用电力的煤炭工业产品就相应提价，电力工业因为要用煤作燃料，又要再提价，这样輪番提价，实质是貨幣贬值。第二，基本建設部門的物資設備以及原材料涨价，使基本建設投資虛假增大，降低投資效果，不利于国家建設。第三，从农业生产看来，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在物价上，几年来部分农业机械、农葯、农业用电价格有所下降，这正是支援农业的措施之一。即使如此，农业生产資料的价格水平还不能說是低的。因此，在節約成本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生产資料价格，这才是政策的要求。很难設想，按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張提高农业生产資料价格，能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能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能有利于貫徹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

二、按生产价格訂价，必然取消价格与价值的有計劃背离的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自发的破坏作用已經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在一定范围内，自觉地运用价格背离价值这一杠杆也可以起某些积极的作用。比如，我們

現在同时生产肥皂和合成洗衣粉两种相关的产品。肥皂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占用資金較少，生产成本也較低，合成洗衣粉則剛好相反，生产过程較复杂，占用資金較多，成本也較高。但由于肥皂生产要耗用大量油脂，在目前油脂生产还未充裕的情况下，发展洗衣粉生产以代替肥皂是必要的，这既可滿足消費的需要，又可达到節約油脂的目的。为了能够从价格上去指导消費，使购买力从肥皂轉向洗衣粉，肥皂的价格訂得高些，洗衣粉的价格訂得低些。从利潤看，洗衣粉不但低于肥皂，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政策性亏损。我們认为这样处理，是能够体现政策要求的。如果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按資金利潤率来訂价，則洗衣粉的价格要大大提高，結果，消費者的购买力必将集中轉向肥皂，洗衣粉既不能代替肥皂达到節約油脂的目的，由于打不开銷路，这个新兴的洗衣粉工业的发展也将遇到不应有的困难。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可以通过計劃去平衡供求关系，但在生活上各方面需要繁多的消費品中，有些产品未能充分供应，也是难免的，因此对一些供应不足的非生活必需品价格訂得高些，可以起到調节供求的作用。对于生活必需品价格訂得低些，如粮、煤、布等对安定广大人民生活有重要作用，而一些比較高級的消費品如呢絨、綢緞、手表等价格訂得高些，既可增加国家的积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調整由于实行按劳分配所带来的职工生活的差別。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所有这些正确的政策措施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三、按生产价格訂价，必然破坏目前正常的比价关系，动摇物价的稳定

保持物价稳定是党的价格政策的基本方針，对社会主义建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民經济的发展和平衡，有利于企业的經濟核算，才能安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調整物价：必然要将我們的物价从現在的体系轉移到另一体系，即从国家价格政策指导下的計劃价格轉向以平均資金利潤率为根据的自由价格，这就引起大量产品的涨价和降价：工业品提价，农产品降价，工业品中重工业品要多提。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价波动，破坏目前正常的比价关系。比如工农产品交换比价，解放前由于城市对农村的严重剝削，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价格低，形成了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十几年来，党采取了稳定工业品价格，逐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来縮小这种“剪刀差”，目前工农产品比价已基本合理。从工农产品指数的变化看，一定量的农产品換到工业品的数量，解放初期比抗日战争前（以抗战前七年平均計算）减少百分之二十四点一，第一个五年計劃初期仍比抗日战争前减少百分之十七点九，第二个五年計劃初期已經恢复到抗日战争前水平，到第二个五年計劃末期，一定量的农产品換到的工业品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六。这对巩固工农联盟、縮少城乡差別、发展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如果按照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以工业产品資金有机构成比农业高而去变动工农产品价格，也就是要提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这就会破坏十几

年来經過調整而形成的基本合理的比价关系，走回国民党統治时期城市剝削农村的道路上去。这当然是会破坏工农联盟，为几亿农民所不能接受的。保持物价的稳定，根本条件是发展生产，保持社会商品可供量和购买力的平衡。生产价格論者的主张，打乱了目前的物价体系，影响人民生活的安定，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又将回过头来进一步波动物价，这样的后果当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

杨坚白等同志似乎也看到按照生产价格制訂价格，将使产品投入流通过程时发生矛盾，所以试图从出厂价和市场銷售价的差离来求得解决，就是說以生产价格来制訂出厂价，而市场銷售价却按另外一个基础来制訂，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我們

知道，出厂价格和銷售价格只是产品投入流通过程的两种不同的价格形式，它們同样要服从于大体上符合价值的客观要求。銷售价格中的税金、利潤，只是生产过程所創造的价值通过商业部門去实现而已。因此，銷售价格不應該也不可能离开出厂价格的基础。我們认为，价格是否正确，必須通过生产和流通的实践来加以检验。既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来制訂的价格在生产領域行不通，在流通領域也不为社会所承认，不为国家政策所允許，总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那末，杨坚白等同志为什么硬要說它是合理的，硬要把它塞到社会主义經濟范畴中来呢？

生产价格論的基本理論依据的虛構性

陈 肇 斌

杨坚白同志和何建章、张玲同志都力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应直接以生产价格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杨坚白同志說：“以生产价格为依据的价格形成，是內在于社会主义經濟本身的客观要求。”^①何、张二同志則說：“社会主义經濟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必然性。”^②按他們說来，这是由社会主义經濟的属于社会化大生产或“社会化大規模經濟”所規定了的。杨坚白同志把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价格的形成，解释成是由于“社会生产已不再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而是社会化的大規模生产”，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經濟同样“属于社会化大規模經濟的类型”，从而得出結論：只有生产价格“才符合于社会化大規模經濟的客观要求”；或者如何建章、张玲同志所說：“社会主义經濟中生产价格的形成，是受物质技术条件……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經濟条件制約的。”

他們論証生产价格的“必然性”，以及宣扬生产价格的种种积极作用，主要就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理論依据而展开的。因此有必要對他們这个出发点进行认真的考察。本文拟专就这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与杨、何等同志商榷。

把生产价格的形成說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 根本违反馬克思主义經濟理論的

生产价格本来是資本主义經濟中形成的特定范畴。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資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而引起不变資本的相对增加，又由于資本主义各生产部門的不平衡发展，从而各部門的資本有机构成产生很大差异。按照价值規律，資本有机构成高低不同的部門的利潤率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各部門資本为爭夺利潤而进行激烈的竞争，以及資本和劳动可以在部門間自由轉移这些条件的存在，使不同的高低不一的利潤率在竞争过程中形成均等的一般利潤率，即等量資本的取得等量利潤。平均利潤率的必然形成和生产

① 杨坚白：《国民經濟平衡和生产价格問題》。載《經濟研究》，1963年第12期。

② 何建章、张玲：《試論社会主义經濟中的生产价格》。載《經濟研究》，1964年第5期。

价格的产生，只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及由其所制约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即主要与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与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作出说明。关键之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商品不是单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生产物来交换。”^①对于资本家来说，他运用一定的资本当然不愿比别人同量的资本得到更少的利润，他总要把资本转移到更能赚钱的部门去，而他们间争夺的只能是工人阶级创造的整个剩余价值，竞争就是资本间的分赃关系。在资本、劳动可以在部门间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在生产的盲目竞争过程中，资本间的分赃条件趋向于按资本额的均等，即形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可见，生产价格是反映资产阶级共同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按资本额共同分赃关系的特定范畴，而且由于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规律的作用，它还必然反映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剥削愈益残酷的社会内容。

很明显，决不能舍掉上述的特定的社会内容来解释生产价格的形成。可是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对生产价格的形成却作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只要有“社会化大生产”（或说“社会化大规模经济”）的存在，就有形成生产价格的必然性。他们力图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找出形成生产价格的共同点——“社会化大生产”，撇开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硬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笼统地归属为同一的“社会化大规模经济”的类型，从而构成了两种性质根本相反的社会经济可以具有形成生产价格的共同要求这样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依据，显然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相违背的，只能是一种虚构。这种理论不仅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甚至也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比自由竞争的阶段有更深的发展，列宁甚至称为“达到全面社会化的地步”^②，这是一种更加集中的社会化。但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财政资本的统治，生产的被垄断，生产价格便不能不被垄断价格所代替（尽管垄断企业间是否存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是可以研究的）。垄断价格就是在资本主义新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垄断资本的要求而形成的，平均利润在企业间不存在了，垄断组织极力用一切办法加强剥削并从非垄断企业夺取利润，“垄断价格是由于扣除实际工资……和扣除其他资本家的利润而得以支付的”^③。我们看，社会化生产更发展了，平均的利润率倒不存在了，可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证明了把生产价格说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站不住脚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生产继续保存下来，而且由于摆脱了资本主义占有制的束缚，有了充分发展的可能。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中，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和各个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版（下同），第3卷，第199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19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129页。

企业，都是在統一的国家經濟計劃下进行經濟活动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滿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潤，更不容許各个部門、企业为追求利潤而进行盲目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起資金和劳动力的自由轉移。它們必須在国家計劃的指导下，分工合作，以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相互支援，共同协作，力爭完成国家計劃任务，以便更好地滿足社会需要，在經濟上保証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經濟任务的完成。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根本不存在必須按資金額比例分配社会总剩余产品价值的必要性，也根本不存在形成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的条件。对于資本主义經濟中的生产价格，馬克思是作过最深湛的研究的，但他从来没有把生产价格推荐给未来的社会。他曾經初步設想过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談到过大体是我們今天的計劃化概念，例如他說过：“社会将会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資料于不同营业部門”^①，还說过：“社会必須預先計算，能用多少劳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在某种事业上（即进行較长期的投資——引者），而不致有害。”^②同时馬克思认为資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因为在那里总是生产“要不断发生而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各种大的扰乱”。回顾馬克思讲过的这些話，我們了解到，馬克思即使是生活在資本主义的发达阶段，他也沒有把平均利潤率当作万灵的藥方，沒有設想过把它应用来为未来社会調节投資和生产，他的着眼点始終正确地放在資本主义内在矛盾上。平均利潤率之能够在一定时期使某一生产部門生产的商品与一定的社会的需要相适应，这是在竞争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大的扰乱才达到的。生产价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形成并成为“自动調节器”的。尽管生产价格論者打算通过計算的方法把生产价格移植到社会主义經濟中来，并声称賦予它不同的經濟内容，但那是不可能的。由占用資金量及其平均利潤率所决定的生产价格，是难以在每一种产品計算上确定并稳定不变的，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随生产价格而俱来的必然是：平均利潤成为衡量、评价經濟效果的尺度，企业生产的轉向追求利潤，以及部門、企业的投資和进行生产都要求根据利潤大小来进行調整，其結果将导致社会主义經濟各部門、企业、单位間相互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当然，生产上发生“各种大的扰乱”，也会成为不可避免。要談生产价格，就不能离开形成它的土壤，否則，就談不上另有什么生产价格。資本主义經濟的历史所已經証明的事实，是我們应严肃加以考虑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經濟中尽管存在社会化生产，但由此絕不可能引出生产价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形成及其运动的規律，只能决定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及受这个規律制約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和价格規律的要求，把生产价格的形成說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不过是虛构的論据。

需要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生产本身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联系着的，不能有超社会的社会化生产，这就規定了我們决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条件来观察和說明社会化生产与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下同），第2卷，第436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78頁。

某种具体經濟現象間的联系。

經典作家在論述資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生产問題时，总是联系資本主义占有制关系，明确揭示出資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化生产与資本主义占有制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指出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和被摧毀的历史必然性。他們从来没有用抽象的社会化生产的概念去解释社会經濟現象，特别是价格現象。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条件有根本不同，主要表現于生产資料的私人占有制的束縛已經解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不存在，生产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利潤而是为了社会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都决定了社会化生产的轉上新的軌道。恩格斯曾預言过：“通过无产階級革命，无产階級夺取社会权力，并且运用这个权力把脫出资产階級掌握的社会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所有。这样，它就使生产資料摆脱它們先前作为資本所具有的全部属性，而使它們的社会本性能够完全自由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依照預先規定的計劃来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① 我国的现实正是这样，由于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改变，生产是有計劃进行的，价格也是有計劃确定的，当然談不到有資本間的竞争与利潤平均化的过程，更說不上有形成生产价格的“客观要求”。把生产价格硬塞到社会主义經濟中来作为計劃价格形成的基础，抛开具体的社会主义經濟条件的作用，抛开所有制关系的差别的特点，含糊其詞地把生产价格說成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种缺乏科学性的論据，显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部門間的互相影响关系不可能成为形成利潤平均化的根据

杨坚白和何建章、张玲同志都十分強調社会化大生产的关于部門間千絲万縷的連鎖联系，按照他們所說：“任何产品的社会劳动消耗水平，任何部門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同其他生产部門的劳动生产率有关”，他們认为一些部門利潤率的提高“不过是分享了另一些部門生产力发展了的成果，实际上这是社会技术进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給全社会带来的好处”，因而“为了正确反映这种联系，价格就应当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杨坚白同志还断言：“只有計量垫支資金的贏利率，以平均利潤为尺度，才能正确衡量各部門对社会的貢獻”。根据以上的理由，他們认为部門間的这种相互影响关系本身就可以提出利潤平均化的要求。我們认为，这种理由，并不能对生产价格論者有所帮助。

平均利潤率从开始形成就一向是也只能是資本的进行分贓的尺度。平均利潤率的最簡單形态，在資本主义前的商业資本間就已形成，恩格斯指出过：“在它的最簡單形态上，証明它是資本主义的历史出发点之一……。”^② 它从来不是什么“正确反映”部門間相互影响关系的尺度。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卷，第154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180頁。

显然，說平均利潤能“正确反映”部門間的相互影响或衡量各个部門“对社会的貢獻”，是难以說得通的。我們要問：一部門对別部門劳动消耗水平的直接或間接的影响，怎么加以确定？怎能恰恰在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可以正确反映出来？难道平均利潤与各种直接或間接的影响都存在某种必然的量的联系嗎？我們再問：由社会技术进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給全社会的好处，又怎样由部門、企业的产品的生产价格上反映出来？难道平均利潤竟能为一些部門提回被“分享”的成果，又能从另一些部門提去恰恰是或大体是它們“分享”去的成果嗎？他們对生产价格的作用的估計，在科学的意义上是难以想象的。生产价格如果确有如他們所宣扬的这种神妙作用，那么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价格就應該是一个現成标本了，而实际上我們从那种生产价格上看不到什么“正确反映”部門間在劳动生产率上的互相影响关系的作用。

生产价格論者会提出理由說，部門間这种影响，是同全社会各生产部門物质技术基础的提高、基本建設的增加分不开的，需要有生产价格承认社会資金在这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我們认为，社会資金对产品的社会劳动消耗的高低和对各部門剩余产品率的大小所发生的影响，是很难从資金的投放于增添技术設備或增加基本建設的数量来加以确定的，借用資本主义的瓜分剩余价值的尺度来衡量、评价这种影响关系，是根本不能解决問題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資金投放量与其产生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影响，决非絕對的等比例关系。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新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但新的工艺生产設備所需的資金，并不比原来那一套所需的貴多少，甚至还有比以前更节省的可能。又如就現有的某些厂矿來說，在原有技术設備的基础上，适当加以改造和扩充，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可以有很大提高，所需追加投資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成倍或几倍地增长比較起来，一般是很小或較小的。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添的新的設備所需的追加投資，在比例上較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是較大的。因此，不應該认为資金投放量与其产生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影响，有絕對的数量上的等比例关系；具体到每一产品，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根本不可能用資金的平均利潤率加以計算和反映。按占用資金計算資金的平均利潤，主要只是提高了高位有机构成的部門和企业的产品价格，很难說由价格提高而从低位有机构成部門、企业轉移来的剩余产品价值，就是这部門、企业对別部門、企业所可能提供的影响的补偿。

二、部門間的相互影响，部門、企业內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减少和剩余产品率的提高，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估計到非資金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們知道，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由于职工的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干劲，往往可以在不增加或很少增加国家投資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引起生产工艺过程的革命性变革。这些都是不可能用資金利潤率或平均利潤来衡量的。

三、生产价格論者很強調占用資金的作用，要求必須有平均利潤的补偿，这不过是

資本主義制度下等量資本要求取得等量利潤的搬用。在價值形成上，会造成歪曲。增加投資不等于比例地多創造了價值。在活勞動不變的情況下，是不會多生產新的價值的。但由投資而增加的設備，可以作為物化勞動將已消耗、磨損的部分轉移於產品價值，所以占用資金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原不是無補償的。固定資產部分一般通過折舊在一定時期內完全可以得到補償，如果在折舊之外又通過平均利潤率來要求補償，這就意味着資金似乎也成了增殖價值的因素，所以是歪曲價值形成的實際內容的。在這裡我們注意讀一下馬克思的話，也許是有好處的：“機器象不變資本的別的構成部分一樣，不生產新的價值，不能在‘利息’的名義下把任何新的價值加進去。又很明白，我們在考察剩餘價值的生產時，不能先驗地在‘利息’的名義下假定已有剩餘價值的任何部分。資本主義的計算方法，顯見是不合理的，和價值形成的規律相矛盾的。”^①資本主義的計算資本“利息”的方法，早經馬克思明確指出其不合理及其與價值形成規律相矛盾，生產價格論者却力圖把它搬用到社會主義經濟中來，這實在是令人奇怪的。

以上我們分析了平均利潤不可能反映部門間相互影響關係的這一方面。

更進一步需要指出的的一個問題是，生產價格論者所說社會化大生產所引起的部門間相互影響關係必然要求通過生產價格加以正確反映，這提法本身還包含有嚴重的理論錯誤。

我們知道，由社會化生產而形成的部門間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及由技術進步所帶給全社會的影響，這種經濟現象毋寧說就是社會化生產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表現。而這種由社會化而引起的影響是不可能通過什麼尺度來加以衡量、評價的。在社會化的生產下，這種相互影響是多種形式的。一個部門某一技術的革新，可以引起其他部門生產上一系列革命性變化，也可以只限於本部門內的變化；一部門由於勞動生產率提高而引起單位產品價值的降低，可以使它在一定時期內按價值以上的價格出售，從而增加利潤，也可以在不同幅度上降低價格，保持本單位一定利潤，同時影響其他部門、單位的生產成本趨向降低；受影響的部門、單位可以是按原來價格獲得價值以上的更多利潤，也可以是相應降價，又引起其他相關部門、單位生產成本的降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及資本間的激烈競爭，經常產生價格的激烈騰降，這種價格變化同樣會在部門、單位間引起一系列的反應。因此部門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是複雜的，引起影響的因素是錯綜的，不可能計算，也不可能求得相互的補償。生產價格不過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價值的轉化形態，是不同部門間資本的競爭引起的，它只體現部門間墊支資本取得均等的利潤率的要求，而且平均利潤率只是一定期限的一個平均數，在各別企業的具體的資金利潤率上還是有很多差別的，無論是一般利潤率或企業的各別利潤率的高低升降，顯然都不是也並非為了在量上反映着部門、企業間相互影響的變化。

現在生產價格論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化大生產所引起的影響，一般都需要得到補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414—415頁注文。

償，这样才能体现所謂“一視同仁、公平合理的經濟原則”，这样意义的补偿意味着什么呢？他們提出的問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如何節約資金和适当解决一些企业間利潤差距的过于悬殊的問題，而是要按資本家瓜分总剩余价值的規律来分取均等利潤，以平均利潤来調整部門、企业間关系。为此，他們制造理由，說社会化的影响，一般地造成一些部門、企业創造的成果为別的部門“分享”，造成一些部門、企业对社会的貢獻在經濟上得不到承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此需要給予“补偿”，需要“把各部門置于对等地位”，用平均利潤来“正确衡量各部門对社会的貢獻”，“从而才能正确处理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关系”。他們主张，应通过平均利潤的分配，使“分享”的成果取得补偿，“公平”待遇，誰也不占誰便宜。他們如此強調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价格，以致实际上又使自己陷入了难以解脫的矛盾，即：社会化生产要求取消社会化生产的后果。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这种提法的荒謬性。

毫無疑問，这种虚构的提法是一定要破綻百出的。生产价格論者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很明显是在用一些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說的理由来对社会主义各生产部門、单位間关系的本质进行歪曲，把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各个生产部門、企业間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力图变成了彼此之間要求按資金分割社会总剩余产品价值，象資本主义私有者那样的相互关系。

•

•

•

生产价格論者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理論依据来論証社会主义經濟中生产价格的必然形成，又据此而大肆宣扬生产价格的种种积极作用，他們的論据，从以上的考察已經完全可以肯定是一种主观臆造。拨开这种論据制造的迷雾，就可以比較清楚看到他們的文章中所貫穿的一条綫就是以利潤为中心的观点。他們实质上是鼓吹追求利潤，为經濟自由化制造理論根据，关于这些，学术界已有不少同志指出，在此不贅。生产价格論者极力把各种各样的观点，附托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論依据上，以之作为立足点，揭穿这个理論依据的虚构性，我們就更可以認識到那些观点是完全架空的，根本站不住的，而从那些观点中所反映的傾向，是我們所应加反对的。

略論以階級斗争促进农业生产斗争

許 士 杰

階級斗争，革命运动，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对这个真理日益有所認識，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要发展生产，要組織和掀起生产的高潮，必須以生产斗争为中心，抓住階級斗争这条綱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掀起生产的高潮。但是，也还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懂得以階級斗争来促进生产斗争。

为什么在有些人的思想中会存在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这些人沒有真正認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我們的农村中还存在階級和階級斗争，不懂得如果不进行階級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广大的貧农下中农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积极性，就无法最充分地发扬起来，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的不断高涨，不可能組織农业生产的高潮。所以进行階級斗争，正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我們知道，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在这个社会中，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而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演变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階級斗争繼續存在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自始至终都貫穿着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抓紧階級斗争这条綱，在政治战綫、經濟战綫、思想文化战綫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促进社会主义建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种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不搞階級斗争，使社会主义革命半途而廢，也葬送了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結果是使社会主义社会蜕化变质，退回到资本主义。所以，任何把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务当作就是埋头生产的想法，都是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沒有認識，不要階級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因而是一种非常錯誤的想法。

其次，这些人对发展生产的目的性还不明确，以为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似乎发展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就算大功告成。当然，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为了解放

生产力，促使生产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毕竟不是仅仅为了改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那是与工人阶级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远大革命理想格格不入的，它至多只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理想。以工人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远大革命理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要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但远不是仅仅以改善眼前的生活为限，更不能脱离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任务来谈改善生活，就是说，改善人民生活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只顾自己一个生产队、一个公社、一个地区，甚至不能只顾自己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改善；在目前，必须看到世界上有三分之二地区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还要大力支援他们。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为彻底消灭阶级创造物质基础，为消灭帝国主义、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为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必要物质条件，总之，也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无产阶级专政，以使它能更好地全面完成它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的伟大历史任务。所以，那种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的想法，不仅是没有远大革命理想，而且在国际和国内不断地开展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容许一厢情愿实现改善一地、一国的生活，偏安自得。可以肯定地说，以这种错误思想去指导工作，必定会迷失方向。在农村还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以这种认识来指导工作，就可能导致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泛滥，他们或者是让属于个体经济范畴的社员家庭副业盲目地发展，削弱和损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或者是把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不管国家计划，不问国家需要，片面追求收入，从而严重影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现，削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导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经济关系的失常，并在政治上不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本来肩负着以工人阶级思想和精神面貌去教育和改造农民群众的艰巨任务，如果忘记这一根本任务，存在着经济主义思想，只问能否增加农民收入，不问政治方向，结果就不仅不能完成党交付自己教育、改造农民的任务，反而会成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俘虏，被农民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识所改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十分警惕。

第三，这些人错误地认为搞生产可以不用政治挂帅，只要积极搞好基本建设，努力推行技术改革，就可以把生产搞好。事实并不是这样。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大搞科学实验，固然是搞好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贯穿在人们的一切活动之中，难道改造自然的斗争和进行科学实验，不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吗！不是贯穿着阶级斗争吗！如果不要政治挂帅，不时刻警惕和打退阶级敌人的破坏和进攻，不改造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不加强热爱集体的思想，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缺乏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怎么能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取得胜利呢？就算把基本建设搞好了，技术改革也取得一定成就

了，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其结果将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① 农民具有两重性。作为劳动者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面；作为私有者这一方面来说，他们又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这一面。“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② 在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农民毕竟还是农民。我国目前广大农村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允许社员保留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副业，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但社员家庭副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私有的个体经济的范畴的。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领域，还容许有一个不纳入国家计划，而以农民互通有无为主要目的的农贸市场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民存在着两种生产的积极性：一种是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一种是经营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如果我们不是对农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农民把从事家庭副业的积极性服从于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正确处理集体经济和社员家庭副业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与壮大集体经济，而是放弃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自流地让社员无限制地发展家庭副业，使家庭副业超过其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的限度，成为“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或“大部靠自己，少数靠集体”，经济来源转变为主要依靠家庭副业，那末，对集体经济的思想感情也会跟着起变化，会出现对集体经济漠不关心，对家庭副业全力以赴，“干家庭副业一条龙，干集体农活一条虫”的情况。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发展与壮大集体经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必然泛滥，集体经济会削弱，基层干部会变质，干群矛盾会加深，封建势力会乘机而起，敌对阶级会反攻复辟。由此可见，在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中，在客观上不断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体经济中，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改造农民固有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怎么能够发挥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怎能卓有成效地去向自然作斗争，取得生产斗争的胜利？

生产斗争是为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斗争，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它总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来实现的。在阶级社会，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一定社会关系，首先就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并相应地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生产斗争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斗争是不可能离开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而孤立进行的，而且它还必须要受政治的支配。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版，第439页。

② 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斗争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斗争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与壮大。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必须在和代表私有制的各种旧社会势力作坚决斗争中，在和千百年来私有制所加诸人们的各种影响作斗争中，来求得自己的发展与壮大。这些斗争主要就体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能动要素。劳动群众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旧社会的，在各个方面还存在着旧社会的各种影响，在一些地方，劳动群众还被新的旧的剥削阶级分子压抑着，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习惯势力束缚着，所以只有不断地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剷除新的旧的剥削阶级分子，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不断地及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清除旧社会私有制所加诸劳动群众的各种影响，才能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生产斗争才能最有成效地进行。

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领域中，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战胜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能回避这种阶级斗争，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力争在这个斗争中取得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也就是使生产斗争遵循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地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抓好阶级斗争，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才有可能不仅促使农业生产出现不断高涨的局面，而且还会出现一种政治上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大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伟业。

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当然，阶级斗争不能代替生产斗争，抓了阶级斗争，并不等于完全搞好了生产斗争。我们必须把在阶级斗争中发扬起来的群众的积极性，及时地引向搞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同时进行一系列的艰苦工作，才能把生产斗争搞好。所以，不能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斗争。因为生产斗争搞好了，为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比较充分、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更加有力的地位，也必然有利于无产阶级更好地开展阶级斗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农村中，如果生产斗争搞得好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得到发展与壮大，农民的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积极性会更为提高。我们农村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与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的时候，连原来那些自发倾向较为严重，站在合作社门外徘徊观望的富裕中农，也会下决心要求参加合作社。当集体经济有了发展与壮大，集体农民的经济生活从集体分配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充分的保证时，他们就更加热爱集体与依靠集体，就不会把家庭副业看作是生活的主要依

靠而热衷于搞家庭副业了。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什么，不能不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态度。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对以集体主义教育和改造农民，不仅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对克服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帮助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农村中社会主义经济阵地的扩大和巩固，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就能更有效地防止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反攻复辟活动。搞好生产斗争，做好经济工作，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必要条件。毛主席曾经这样教导过：“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①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是有密切联系的，阶级斗争服务于生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来推动生产斗争，生产斗争又会反过来有利于阶级斗争。决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埋头搞生产斗争，也不能抓了阶级斗争而丢掉生产斗争。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兴起一个农业生产高潮。今年的生产高潮，是在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兴起的。在系统地开展这一运动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成了生产建设的动力，生产高潮必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而到来；在还没有开展运动的地方，我们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来部署工作。

在农村工作中抓好阶级斗争来推动生产斗争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根据过去的这些经验和当前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供同志们研究。

一、关于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各级组织中，建立起一个坚强的，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革命化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农村基层单位是否有一个坚强的彻底革命化的领导核心，对于能否抗拒敌对阶级的进攻和旧思想习气的腐蚀和影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促进生产，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如果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必然对农村中存在着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在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和“和平演变”的腐蚀下，会不知不觉地做了敌人的俘虏，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泛滥和封建势力的复辟鸣锣开道，甚至沦为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从而严重地摧残劳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瓦解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阵地。反之，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必然能对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动向有灵敏的反应，能够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并带领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向农村中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必须认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慎重地挑选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版，第439—440页。

織的領導幹部，使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手中。同時必須健全和純潔黨在农村中的基層組織，使其能發揮戰鬥堡壘的作用。有了徹底革命化的領導核心，才能有效地開展階級鬥爭，並以此來推動集體經濟的生產鬥爭。

二、關於堅決依靠貧農下中農，組織一支革命化的階級隊伍的問題。無論在农村的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依靠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貧農下中農。貧農下中農，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农村中的堅強支柱，是黨在农村工作中的依靠力量，是社會主義道路最堅決的擁護者，是階級鬥爭中立場堅定，方向明確，在生產鬥爭中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英雄。先進的貧農下中農顧大局，識大體，勇于担重担，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也不是局限於小集體，而是時時刻刻關心國家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有“腳踩污泥，胸懷天下”的崇高的革命風格；有為集體利益勇于鬥爭，為集體事業竭盡全力的高貴品質。貧農下中農是革命幹部的臂膀。必須認真組織一支革命化的、堅強的貧農下中農階級隊伍，來積極支持革命化的領導核心，幫助和監督幹部做好工作，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堅決和一切壞人壞事作鬥爭。有了這樣一支革命化的堅強的階級隊伍作為依靠，領導核心才能有效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帶領絕大多數農民勝利地進行反對各種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階級鬥爭，擊敗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各式各樣的腐蝕和反攻復辟活動，並有效地組織生產，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三、經常地深入地不斷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教育，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不斷改造自私狹隘的小農意識。這也就是要在經濟上、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不斷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反對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封建殘余勢力，按無產階級精神面貌來教育改造農民，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在农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不僅需要經常地持久地進行，而且還要根據农村中階級鬥爭形勢發展的具體情況，在一定時期內，集中地系統地進行，使社會主義革命在各个方面取得徹底的勝利，使農民受到深刻的教育，能夠更好地逐步革命化。當前廣大农村中正在進行的規模巨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根據社會主義的徹底革命的原則，在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這四个方面進行清理和基本建設，在農民群眾中進行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就是這種措施的具體表現。

四、認真貫徹黨的有關政策。黨的關於农村工作的一切政策，是我們在农村搞革命和建設的依據，它是集中了廣大勞動農民的意志，並根據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要求來制訂的，最能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真正的根本利益。把黨的政策交給農民群眾，教育農民群眾，使他們知道真理，明確共同的目的，知道要做的是怎麼一回事，應該怎麼樣做法，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大家齊心協力來貫徹到底。“眾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組織與發動起來的勞動群眾，沒有什麼事能難倒他們，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一定能夠在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取得徹底的勝利。

农业生产中的因地制宜与 农业生产合理布局

李 穎

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革，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指出：“在发展农业生产和采取技术措施的时候都必须特别注意因地制宜的重要性”。^①

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是适用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因地制宜原则显得特别重要。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农业生产既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又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必须适应和合理利用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农业生产，并在生产中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农业生产中的因地制宜原则，首先是指农业生产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它的生长和发育必须借助于土地和周围的自然力。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的环境条件是相互统一的。一方面，每种作物的生长发育都要求一定的环境条件，具体地说，即要求一定的热量条件、光照条件、空气条件、水分条件和营养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个地区有其相对稳定的自然条件。而作物所要求的环境条件和当地所具备的自然条件在多大程度上相互统一，是决定作物能否生长发育或生长发育得好不好的首要关键，也是农业生产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首要关键。每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而且是比较地稳定不变的。要在这个地区做到作物和环境条件间的相互统一，很明显，主要地应该以作物去适应自然环境条件，而不是以自然环境条件去适应作物。这就决定了一个地区进行哪些农业生产，首先决定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如水稻抽穗扬花要求20—25°C的温度，如果某个地区的气候条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而勉强在那里种植水稻，稻谷生产就将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在那里进行稻谷生产，而应改种其他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作物。这不过是单项自然因子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自然条件都是以其综合的作用制约着农业生产的，情况就显得比较复杂。

动物对自然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比植物强得多，动物饲养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也比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4页。

植物栽培小。許多对植物栽培有很大限制作用的自然因素如溫度、光照、雨量等，对于动物飼养則影响不大。另一些自然因素如土壤性质等，則几乎对动物的生长发育沒有影响。除了一些极端性的动物外，大部分畜禽都可以在寒、溫、热三帶飼养。但是，这并不等于說，自然条件对动物飼养沒有或只有很小的影响。动物是靠飼料来飼养的，飼料的絕大部分来自植物，而植物的生长发育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是比較大的。無論是牧場的牧草、耕地种植的飼草或用作飼料的农业副产品，其种类、数量和质量以及供应季节，都和当地的自然条件、自然資源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又轉过来影响飼养畜禽的种类、数量和經濟效益等。这样一来，动物飼养业虽然不象植物栽培业那样直接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資源的制約，但也通过飼料間接地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資源的影响。因此，在决定畜禽种类和飼养規模时，同样有必要考虑当地自然条件和自然資源的情况。如我国西北地区和內蒙古草原地带广大的牧場，适于飼养成群的牛、馬、羊。而东南广大农区有丰富的农副产品，則宜于普遍飼养生猪，就是很明显的例証。

必須看到，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自然条件对野生动植物地理分布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体现了人类、动植物、自然条件相互間的关系。而后者則仅体现动植物与外界环境条件之間的关系。人类在生产中所結成的生产关系和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通过农业生产設備或改变动植物本身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創造条件，使在天然的情况下不能在当地生长发育的动植物順利的生长发育。例如，由于兴修了水利，引黃灌溉，在干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也能很好地种植水稻；由于对品种特性进行了定向改造，从前只能在北方生长发育的苹果，現在在长江以南也能够进行生产。一般而言，社会制度愈进步、科学技术愈发达、經濟力量愈雄厚，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就愈强。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制約也就愈小。但是，人类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是一个长过程，特別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內，或由于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或由于科学技术和經濟力量的不够雄厚，或二者兼而有之，人們总是不能完全从心所欲地去控制、改造自然和动植物本身的特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截至目前为止，人类在改善农业生产的地球因子（包括水分、营养条件等）方面已經取得很大成就，但对如何大面积地改善农业生产的宇宙因子（包括热量、光照、空气等），仍然沒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在这方面，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約。即使在改善农业生产的地球因子方面，也仍然存在着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經濟上的合理性問題。因此，总的說来，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依然突出的存在着，并将始終作为制約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这即是說，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生产，是現在和将来都必須遵守的原則。

农业生产因地制宜的原則不仅是就农业生产應該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而言的，而且也是指农业生产應該适应当地的經濟技术条件。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經濟再生产的过程。每一种农业生产除了要求一定的自然条件外，还要求一定的經濟技术条件，即要求一定的劳畜力、肥料、农机具、其他农业設施和耕作飼养技术等。自然条

件只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可能性，必須通过經济技术条件，才能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如蔬菜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在劳动力和肥料不足的地区，即使自然条件适宜于大面积种植蔬菜，也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經济技术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自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經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加深了对自然的利用，扩大了农业生产的内容，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各地区的經济技术条件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虽然它在一定的时期內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但与自然条件比較起来，是比較容易发生变化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許多复杂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使各地区的經济技术条件互不相同，其差异性較之自然条件有过之无不及。因此，在两个自然条件相似而經济技术条件不同的地区，农业生产的种类和技术措施固然应当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个人地区，經济技术条件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种类和規模也必須相应改变，才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經济和技术条件，向自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这即是說，因地制宜的原則实质上也包涵了因时制宜的含义在內。如广东新沙田地区经过修筑堤围和兴建电动排灌站，提供了由单造稻田改为双造稻田和稻蔗輪作的可能性，这时农业生产經營就应该对此充分加以利用，以使土地利用率和产量得以提高。

因地制宜的原則还适用于农业技术改革和增产經驗的推广。农业四化的輕重緩急、方式、方法和实现途径，都应针对当地自然条件經济条件来拟定。必須首先解决那些在当地來說技术上可能而又最急需解决、經济效果又比較显著的环节。如我国黑龙江省，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劳力較缺乏，必須首先实现耕作机械化。而珠江三角洲受咸潮威胁，必須首先实现排灌机械化。又如拖拉机的选型、配套、农机具搭配以至农机具的设计等，都与各地区的地形地貌、地面割裂情况和土壤性质等有密切的关系。增产技术的推广，与当地的自然經济条件更有密切的联系，二者当中任何一方面条件不够具备，都有使农业生产遭到損失的可能。因为各地区的自然經济条件不同，在一个地区是成功的增产經驗，在另一个地区就不一定是成功的經驗了。举例而言，拿水稻的合理密植來說，在土壤肥力較高的地区应该适当降低密植程度，利用較高的肥力促进分蘖，虽然插苗較少，但最后仍能达到所需要的株数和叶面积，充分利用太阳光能和土地肥力达到高产，又节约了种子。在土壤比較瘦瘠的地区，水稻分蘖能力較弱，就必须适当地多插苗，才能达到一定的穗数和叶面积，达到一定的产量。这說明土壤肥力不同，栽培技术也要因之而异。又如广东沙田地区将“掙槁”田改为“翻耕”，^①这本来是走向精耕細作的好办法，但是如果不考虑劳力、畜力和肥料等条件是否跟得上，盲目地将改“翻耕”的面积放得过大，反而会因失誤农时而减产。相反地，如果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有了一定的条件，机耕面积能够扩大，劳畜力和肥料也有增加的条件下，不积极地将“掙槁”田改

① “翻耕”和“掙槁”是广东沙田地区稻田的两种不同的耕作制度。“翻耕”是指早稻收割以后翻耕再插晚稻。掙槁是适应沙田地区劳畜力不足的耕作制度，在早造插秧时留下較大的行距，插后半至一月內再在早稻行間插上晚稻，收割早稻后留下晚稻繼續生长发育，不再翻耕。

为“翻耕”，就不能充分地利用当地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这又说明，耕作制度要与经济条件相适应。

在因地制宜地部署农业生产时，不仅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来部署每一项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个农业部门结构和作物组合的角度来考虑因地制宜的问题。这是因为农业生产中工作时间和生产时间的不一致，决定了每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必须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地区内农业部门结构和作物组合问题。如果部门间和作物间的比例安排恰当，就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减少以至消灭劳畜力和农具使用的季节性不均衡，同时农业部门间和作物间还可以相互提供和利用副产品，达到相互促进和取得较高经济效果的目的。反之，如果部门间和作物间的比例安排不当，它们之间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收不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因此，力求农业生产各部门间和作物间的比例符合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是因地制宜地领导农业生产的重要问题。

无数的实践证明，只有在农业生产布局和技术措施中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才可以适应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点，农业的自然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也只有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才能合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取得农业生产的最大经济效果。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因地制宜的原则乃是客观存在的要求，它是指导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革的重要客观原则。

因地制宜地进行农业生产布局是比较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却是很重要的问题。正确地解决农业生产合理布局问题，除了要首先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外，还要处理好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生产联系。因为在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每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就不再是孤立地进行的了，它与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联系。另外，每个地区内部农业生产各部门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各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不同，它与其它地区在农业生产上的联系方式和本地区内各部门间、作物间的比例也应因之而异。要正确地解决农业生产布局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合理地从各地区间的生产联系和地区内部生产联系出发，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经济条件，揭示出各种农业生产最有利的发展地区，并合理安排区内各部门间和作物间比例。如果仅仅从一个生产单位或一个小地区出发去考虑因地制宜问题，必然是孤立而片面的，不可能较合理地解决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问题。

各地区间在农业生产上的联系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而地区内农业生产各部门间、各作物间的联系则表现为区内农业生产的综合发展。实行地区间农业生产地域分工与区内农业生产综合发展相结合，并在生产中采用最适宜的技术措施，是合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获得农业生产最大经济效果的前提条件。每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都有最适宜发展的农业生产部门，在那里较集中的安排最适宜于当地的农业生产，较之在各地区不分轻重地安排各种农业生产，可以更充分地发掘自然、经济潜力，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同时，集中的、规模较大的生产也较分散的、规模较小的生产在经济上合算。总的说来，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实行农业生产地域分工，可以收到较大的经济效果。可是，如果在一个地区过多的安排了一种农业生产，区内农业部门间和作物间缺乏

适当的比例，在技術上會因為單一種植而逐漸損耗地力，使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逐漸下降；在經濟上，也會因為生產勞動的時間過於集中，使勞動力和農機具的使用帶有明顯的季節性，降低了利用率。同時，由於區內沒有綜合性生產發展，也不能較好地滿足本地區人民對農產品多種多樣的需要。這些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原因，使過分專門化的農業生產不能長久保持較高的經濟效果。正確的應當是在地區間實行農業生產地域分工，在地區內部實行多部門綜合發展；在部門結構上要使每個地區都有重點發展部門又有全面的安排，並使部門間和作物間有正確的比例，才能在整體上最合理地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經濟條件，長久保持較高的經濟效果。

農業生產地域分工對提高農業生產經濟效果有重要的意義。但是農業生產是在廣大的土地上進行的，在不同大小的地區範圍內考慮農業生產地域分工所帶來的經濟效果並不相同。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內最適宜於某種農業生產的地區，在較大的範圍內看來，就不一定是最適宜的地區了；在較小範圍內最適宜於這種農業生產的地區，在較大的範圍內，很可能更適宜於另一種農業生產。換句話說，因地制宜必須有全局觀點。考慮的地區範圍不同，農業生產布局可以作出不同的安排。一般說來，在一定限度內，從較大地區範圍出發來考慮農業生產布局問題，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效果。因此，在實踐中，農業生產布局應當從全國、全省一盤棋的原則出發，作出統一的安排，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貫徹因地制宜的原則，收到更大的經濟效果。在這裡，如何才能在全局上更好地滿足國民經濟的需要，就具有了決定性的意義。

綜上所述，從全國、全省一盤棋的原則出發，實行農業生產地域分工和區內綜合發展相結合是農業生產布局的最好形式，也是因地制宜地領導和規劃農業生產的關鍵問題。

農業生產地域分工和區內綜合發展相結合是社會制度和農業生產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產物。在農業生產發展的過程中，人們能否實行農業生產地域分工與區內綜合發展相結合，主要決定於社會制度、農業生產水平和交通運輸狀況。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以小農經濟為主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力低落，經營規模小，交通也不方便，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剝削者及直接生產者本身多方面的需要。農民必須在小塊土地上種植生活所需的各種農作物。在這種情況下，地區間很少進行交換，不可能實行農業生產地域分工，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實行因地種植。到了資本主義時期，生產規模擴大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交通運輸也發達起來，商品性生產佔了主導地位，形成農業生產地域分工和生產專門化，才可以在較大的程度上實行因地種植。但是，由於土地私有制和農業生產的資本主義經營，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高額利潤；一個地區究竟進行什麼專門化生產，首先考慮利潤的多少，其次才考慮地區的適應程度；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和專門化是自發形成的，地區間農業生產的分工是不合理的，地區內部農業各部門間和各作物間也缺乏有機聯系和正確比例。而且往往實行片面的專門化生產，缺乏區內農業生產的綜合發展，不僅不能合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經濟條件，而且會

使地力迅速耗竭，产量无法稳定提高。这样的农业生产地域分工和专门化只为资本家带来高额利润，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的。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在农业生产中充分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

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是建筑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目的是尽量满足人民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土地改革完成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生产力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要求，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也就是说，实行农业生产地域分工与区内综合发展相结合，是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作用下，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特别有利于在地区间实行农业生产的合理分工和区内农业各部门各作物按适当比例发展，合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农业生产各部门都比较迅速的发展，并获得较高而且持久的经济效果。这又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最迫切地感觉到因地制宜地部署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也才有可能真正按照国民经济需要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来进行农业生产布局。

社会主义制度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地区间农业生产合理分工和区内综合发展相结合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从而也为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创造了优越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并不能自发地形成，因为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和在生产中采用合理的技术措施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各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不同，它在农业生产地域分工当中的地位、它本身内部农业部门结构和作物组合，以及所采用的技术措施，也应当不尽相同。如果没有对各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群众的生产经验作详细而综合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配置农业生产和制定适当的技术政策。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幅员广大，自然经济条件极为复杂，各地已经形成的农业生产布局也仍然有不合理的地方。要真正做到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配置农业生产和制定技术政策，不能仅凭过去积累的比较分散的经验，必须在全面了解各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生产特点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的原则，加以综合分析整理，使这些乍看起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农业生产情况，显示出地域分布的规律性，为因地制宜合理地进行农业生产布局和技术改革提供系统资料和科学论证。目前全国各省、区进行的农业区划工作，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

对“利潤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的商榷

周治平 萧 凡

黄标熊同志在《利潤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一文（載本刊一九六四年第四、五期合刊号）中，批評近几年来在政治經濟学的教学中提出的一种“不妥当的說法”，即“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他认为“利潤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

其实，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这并不是近几年来在政治經濟学教学中提出来的新理論，而是在近百年前，馬克思已經彻底解决了的問題。《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的标题就是“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和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可見黄标熊同志根本沒有理解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和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的原理。現在，讓我們来考察一下黄标熊同志为他的論点所找到的三條理由，看它們是否“妥当”。

他的第一條理由是：“不能因为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轉化形式，就引申为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据他看来，利潤与剩余价值之間是“表現形式”和“內容本质”的关系，所以可以說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轉化形式，而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間，完全不是这种关系，所以不能說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同时，他以統計学上关于比率的概念，来作为“利潤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的論据。

我們认为，这条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首先，馬克思从来就沒有从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轉化形式，去引申出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恰恰相反，馬克思从成本价格出发，分析、論証了剩余价值怎样轉化为利潤和剩余价值率怎样轉化为利潤率之后，就明确地指出：“应由剩余价值率到利潤率的轉化，推論剩余价值到利潤的轉化。不能反过来。”（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六頁。以下引語只注頁數者，均同此書）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呢？

我們知道，馬克思不是把利潤对預付总資本的比例称为利潤率的，而是把剩余价值对預付总資本的比例称为利潤率。“利潤率是 $\frac{m}{C} = \frac{m}{c+v}$ ”。（第二六頁）这正好表明剩余价值不是直接表现为預付总資本的产物，即不是直接表现为利潤，而是通过顛倒的方式，即通过“以利潤率为过渡而轉化为利潤形态的”（第二九頁）。馬克思明确地說：“总資本的价值量，就其自身說，与剩余价值量，沒有任何內部关系，至少，不是直接的有內部关系。”（第三〇頁）因为，剩余价值只是和可变資本有直接的內部关系，剩余价值只是

应当和可变資本发生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率。但是，在資本主义經濟关系的現象形态上，剩余价值却表现为与預付总資本的关系，即剩余价值采取与預付总資本的比例关系而出現，表现为利潤率，这是因为在資本家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的分別。正是通过剩余价值与預付总資本的关系，剩余价值才取得了向利潤的轉化，在資本家的观念上成为全部預付資本的产物。因此，利潤实质上虽然是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并不直接表现为利潤，而是通过利潤率这种顛倒过来的方式来表现为利潤。所以，我們就不能从剩余价值轉化为利潤，去推論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而是要按照馬克思說的“应由剩余价值率到利潤率的轉化，推論剩余价值到利潤的轉化”。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利潤率才是历史方面的起点。”（第二六页）现实經濟生活告訴我們，每个資本家在他开办工厂的时候，他是从現有的利潤率出发，来計算他投資应得的利潤的，虽然这时候，他还没有得到任何真实的利潤。所以，在客观上，利潤率发生在利潤之前。然后，資本家把他已經获得的剩余价值，看作是他的預付总資本的“产物”，这时候，剩余价值才轉化为利潤，才获得了利潤这种形态。可見，利潤只有在利潤率中才获得自己的固定性，就是說，它离不开利潤率，它只有在利潤率中才表现出自己确实是預付总資本的产物。反过來說，如果离开了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利潤就既不能也无从表現其为資本的产物了。

其次，认为利潤与剩余价值之間是“表現形式”和“內容本质”的关系，可以說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轉化形式，而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間完全不是这种关系，所以两者之間不存在轉化关系，这和馬克思的論述并不符合。有必要指出，黃标熊同志关于“表現形式与內容本质的关系”的說法，是把形式与內容和現象与本质这两对不同的范畴等同起来并混在一起了。不过从其論述来看，可以看出他是把利潤和剩余价值的关系看做形式与內容的关系，而这是不符合馬克思的說法的。馬克思說：“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說，是不能一看就明白的东西，是要研究的本质物，利潤率及剩余价值的利潤形态，却会在現象的表面上指示出来。”（第二六页）这句话不仅充分表明了利潤和剩余价值之間是現象与本质的关系，也明确地指示了利潤率与剩余价值率之間的关系同样是現象与本质的关系。因此，黃标熊同志根据所謂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間不是形式和內容的关系，而否定剩余价值率之轉化为利潤率这个提法的正确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再次，黃标熊同志以統計学上关于比率的概念，来作为“利潤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的論据，是不妥当的。从統計学来看，此比率确实不是那比率。但是，从政治經濟学来看，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不只是有本质区别，而且有內在关系。馬克思就曾指出：“同一个利潤率能表示种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率”，（第二五页）馬克思也把利潤率看作是“依总資本計算的剩余价值率”。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学研究利潤率、剩余价值率、利息率等等，都不是从統計学、會計学或数学的計算方法来研究的（虽然它要用統計，會計和数学的計算方法），而是从資本主义經濟关系在现实运动中的表現形式、轉化形式来研究的。政治經濟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揭露資本运动的各种形式及它

們之間的关系。因此，决不能用統計学上的概念，来代替政治經濟学的理論分析。

黄标熊同志的第二条理由是：“利潤率与剩余价值率是两种不同的比率，质和量都不同，两者之間不存在轉化关系。”这条理由也是根本錯誤的。

首先，說质和量不同的事物之間，“不存在轉化关系”，这是违反辯証法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的武断。我們說，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轉化，正是指两个不同质的事物之間的轉化；相反，如果两个事物的质和量都是相同的，相同事物之間当然无所谓相互轉化的关系。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首先决定于事物本身的內因，其次决定于外部条件即外因。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条件下，能轉化为利潤率，正因为剩余价值率与利潤率之間有內在联系，即都是以剩余价值为基础，以同一数量的剩余价值与不同数量的資本相比的結果。

其次，我們完全可以把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潤、利潤率等等，当作独立的概念，因为它们各自有其特定的质的規定性，都有其特有的运动規律。但不应当只看到它們之間的區別，而否认它們之間的內在关系。不仅如此，我們还要善于揭露它們之間的各种关系。須知社会經濟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資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不仅轉化为利潤，还要通过利潤进一步轉化为利息、地租等等。这些范畴，和剩余价值之間是质和量都不尽相同的。我們能否因此就否认它們之間的轉化关系呢？显然是不能的。否則，我們就沒有可能从資本主义經濟关系的种种現象形态中揭露其本质了。

黄标熊同志的第三条理由是：“說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不利于揭露利潤率和利潤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掩盖作用。”这条理由同样是錯誤的。

我們知道，本来剩余价值是工人創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它被資本家无偿占有，这就表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存在着剝削与被剝削的階級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剩余价值是以利潤的形态而出現的，因此，就使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及其本来面目，被隱蔽起来了。剩余价值好象不是工人創造的，而是資本自行增殖的結果了。这样，就掩盖了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被神秘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利潤这种現象形态，掩盖了資本的剝削本质，只有通过科学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的作用也同样如此。剩余价值率本来是表示資本家对工人剝削的程度，由于轉化为利潤率，就变为表示資本自行增殖的程度了。这样，利潤率不只是掩盖了剝削的真实程度，而且进一步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这正說明作为資本主义現象形态的利潤与利潤率等范畴的不合理性。事实上，資本主义的經濟关系就是通过种种虛假的外观顛倒地表現出来的。在利潤和利潤率这种形态中，工人階級与資本家階級之間的关系，不是按照本来的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表現出来，而是作为資本与它的成果之間的关系，即物与物之間的关系表現出来的。政治經濟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資本主义經濟关系的各种表現形式，剝开它們神秘的外衣，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如果把利潤与利潤率看作是独立自在的，与剩余价值率毫无关系的东西，不承认它們之間存在着的轉化关系，我們就无从認識資本的本质。反之，我們說“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掩盖了对工人的剝削程度”，是完全符合客观現實的，这就有利于我們認識資本的本质。

关于科学抽象的具体内容

——《論持久战》中的邏輯問題初探

章 沛

革命实践中的思維活动問題，是邏輯科学領域中的一个嶄新的問題。这一問題，实质上是有关如何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种活动紧密地銜接和結合起来的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抽象，为認識世界提供了真实的思維材料，同时，也为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建造蓝图。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中，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总是完美地被反映为科学的統一体。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抽象，是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而具体地分析对象的具体矛盾，則是辯証思維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同志对“持久战”的分析，則是具体地分析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具体矛盾的典范。在革命实践中，是我們爭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指南，而在思維活动上，則為我們提供了从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的思維活动过程的邏輯规范。

毛泽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中，具体地分析了持久战的具体矛盾，而且还把这一分析跟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矛盾的具体分析，以及关于解决这一矛盾的具体分析邏輯地联系起来，既解决了“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的問題，又解决了“怎样做”的問題；从而，明示了从認識矛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思維途径，体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实践到認識，从認識到实践这个过程活生生的辯証思維的規律性。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論持久战》中的邏輯方法，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掌握辯証邏輯这一有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維武器，掌握毛泽东思想在方法上的基本要求，来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建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

但是，《論持久战》以及毛泽东同志其他著作中的邏輯問題，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因此，必須有待于邏輯学界的辛勤的集体努力，才能作出具体的闡明。本文仅在科学抽象的具体内容这一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科学抽象是对象的本质、全体和內部联系的正确反映。

在《实践論》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內部联系了”^①。然后，跟着又指出：“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下同），第1卷，第274頁。

識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論理的認識則推进了一大步，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①同时，还指出，这样的認識，也就是列宁所說的“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的“科学的抽象。”^②

科学抽象在思維中的概括表現形式虽然仍然是概念，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所謂概念。

一般的所謂概念，也就是以內涵和外延为其內容的概念；內涵表現为定义，而外延則是指：具有定义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所有对象。

然而，科学抽象既然是对对象的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因而，它所反映的，就不再限于简单定义所反映的本质属性，而是对象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亦即对象的客观体系。这样，科学抽象的具体內容，就比一般的內涵、外延远为丰富、远为全面。在《論持久战》中，“持久战”这一概念，就是这样的一种科学抽象。

“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特点是：它不单只具有确定的內涵和外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本质的、規律性的东西。“持久战”具有自己的內在的概念体系，反映着对象的客观体系和預見到战争发展的規律，为我們認識抗日战争、指导抗日战争和从事抗日战争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导性的理論。

什么是“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具体內容呢？它的具体內容在《論持久战》中，又是如何以实际为基础来进行邏輯的展开呢？

在《論持久战》中，“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具体內容的展开，是通过两大步骤来实现的。第一个步骤，展开的是：“持久战”是什么这种具体內容；第二个步骤，展开的是“持久战”应怎样做这种具体內容。

关于“持久战”是什么这种具体內容的展开，是这样进行的。

在《論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除了反对亡国論和速胜論的錯誤意見之外，首先就扬弃了“芦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民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他指出，“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因为这是“空洞无物的了解”。^③关于“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在思維中的展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了要把这一“空洞无物”的，但是“对的”公式加以“充实”，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抗日战争作了具体分析。分析是从中日战争的本质特点开始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④以此为根据，就可以从中日两国的实际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結論：“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

①② 分別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275—277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0頁。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頁。

勢。”“于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国会亡嗎？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嗎？答复：不能速胜，必須是持久战。”①

这样的持久战的发展規律和过程，具体地表現于三个阶段之中，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这就是关于“持久战”的最基本內容。

“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繼續发展，是和具体地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中，在指出了持久战上述的最基本的具體內容之后，就进一步分析了它在战争形态上的特点：犬牙交錯的战争形态，以及这种犬牙交錯的战争形态的具体表現——內綫和外綫、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

大体說来，这就是关于“持久战”是什么这个方面的具体內容的展开。在这个展开的思維过程中，我們看到的，实质上是关于对象的具体分析的过程。在这个思維过程中，映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反映对象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含有对象本质、发展規律和过程，具体現象形态等等方面（“方面”，在思維上就称为“范畴”），而这些方面，又反映为一定的概念体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的日本”等等，“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等等，“內綫”、“外綫”等等，并且彼此处于一定的必然联系之中，形成一个体系。

由此可見，关于科学抽象的具体內容的展开，不同于一般的所謂对概念下定义（下定义也是概念內容的展开）。下定义是确定地掌握概念內涵（含义）的邏輯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反映的、認識到的是对象的区別的本质属性。“持久战”这个詞，如果作为一般的所謂概念，那么它就仅仅具有“长期的战争”的含义，它指的是古往今来所有的长期战争。即使就抗日持久战來說，也仅仅具有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长期战争这样的含义。显而易见，下定义所揭露的概念內容，不同于科学抽象在具体分析中所展开的內容。但是，两者并不存在邏輯矛盾，因为作为科学抽象的思維表現形式的“持久战”，它的确也具有这样的一种簡單含义，否則，它岂不是只能具有“非长期的战争”的含义了么？不过，它又不仅仅具有这样的起碼含义，而且具有进一步的更丰富的內容。所以，概念的形式定义既是必要的，但相对于科学抽象的具体內容來說，从反映对象的認識作用來說，却是有其局限性的。只有对科学抽象的具体分析、具体展开，才能全面地、深刻地反映对象。不認識这一点，就不能在認識論角度上看出一般的所謂概念（形式邏輯所描述的概念，或用列宁的話來說，“抽象的概念”②）和科学抽象（辯証邏輯所理解的概念，或用列宁的話來說，“具体的概念”③）之間的联系和差別。

現在，来談談关于“持久战”該怎样做这一方面內容的具体展开的問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8—459頁。

②③ 均見《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2頁。

关于“持久战”是什么这方面的具体内容的展开，是完全必要的，它对我们认识持久战的全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持久战不单只是认识的对象，而且它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就抗日战争来说，又是我们的一种革命实践。因此，关于持久战的认识，就必须继续深入，而关于持久战的具体分析的思维活动，也就必须继续前进。这样，我们就要进入关于“持久战”该怎样做这一方面的具体内容的展开，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指导规律”的分析了。“持久战”该怎样做这方面的分析之所以同样成为反映对象属性的“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具体内容，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关于作为实践活动的“持久战”的一种认识，另一方面，则由于指导规律本身就是实践的规律，并且通过具体行动，就将转化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上文关于持久战现象形态的描述，正是指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关于“持久战”该怎样做的具体分析，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持久战的自身的具体分析，这种具体分析，在《论持久战》中，是从关于战争的一般本质开始的。从而，“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另一面（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一方面）的展开，这一种思维活动，是从“战争”一般开始的。

《论持久战》中指出，作为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战争不同于其他的实践活动，这便是战争和非战争的实践活动相比较下所具有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写道：“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①

但是，就战争之为战争而言，各种不同战争又有其自身共同之点——目的，这便是战争自身的一般性。关于这点，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②然后，又再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③紧接着，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这一战争本质的决定性的作用说：“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④

把关于“战争”的这一本质的掌握，落实到中日战争中，就是：“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2页。

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①结合到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情况，战争目的还必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

再把这个战争本质和中日战争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落实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时，就得出这样的战略战术方针：“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②

到这里，关于战争自身的一般性质（自身目的）的分析，就和关于持久战的具体分析“会师”了。这一“会师”，为“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增添了关于战略战术方针的新内容，实现了“持久战”的进一步的逻辑展开。

在提出了持久战的总的方针之后，《论持久战》继续分析了种种战术或方法（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箝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等），并且还分析了选择战术的三个关节（时机、地点、部队）。进一步，《论持久战》又分析了持久战的战争形式（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分析了主要的作战形式（运动战）和次要作战形式（游击战）及其转化，分析了游击战把自己变为正规战的转化等，然后，又落实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中，得出：“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③

之后，《论持久战》还就战争的实际效果（歼灭战、消耗战）、效果在三个战略阶段中的要求、战斗形式、决战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对“持久战”进行了全面的展开。

在全部分析中，贯穿着：战争是人的流血的政治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体现这一基本精神。

此外，《论持久战》还就战争和政治、战争和和平、战争和根据地，以及其他种种有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具体分析。

这就是《论持久战》对持久战这一对象自身所进行的具体分析的粗略复述。在这个分析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关于持久战自身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含有：一般本质（目的）、方针、形式、效果等等方面（“方面”，在思维中就称为“范畴”），而这些方面，又都反映为一定的概念体系：“战略持久”、“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等，“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等等，“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等，“歼灭战”、“消耗战”等等，并且彼此处于一定的必然联系之中，形成一个体系。

然后，所有以上一切具体内容，又总结于“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中，而和另一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8页。

有关的东西：如政治、和平等等处于一定的必然联系中，形成更大、更广泛的另一体系。

由“持久战”是什么、“持久战”该怎样做两大方面构成的具体内容，以及“持久战”和其他有关东西的必然联系，这就是在《論持久战》这一天才著作中，为我们提供的：关于持久战这一对象的具体分析，亦即对“持久战”这一科学抽象的展开的一个总结性的轮廓。

在关于“持久战”该怎样做这一方面具体内容的展开和论证中，提出了逻辑科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即：为了改造世界而进行的思维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是崭新的问题，是由于形式逻辑从来所关心的，只是认识世界的思维过程（假设部分也不例外）；而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也接触到目的、手段等问题，但仅仅是从唯心哲学的、绝对理念的自我实现这一角度加以考察，而且也没有就其逻辑思维过程进行研究。然而，在《論持久战》中，则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思维过程，展示出了关于“持久战”的一整套指导规律。这就为逻辑科学展示了新的领域，为逻辑科学关于“为了改造世界而进行的思维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标本。

以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的思想为指导，研究这一逻辑科学中的崭新的问题，具体阐明这一思维过程，将为逻辑科学和革命实践的结合及为革命实践服务展开了历史的新页。这一艰巨任务，有待于逻辑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評《三家巷》《苦斗》評論中的錯誤傾向

文 齊 思

通过几个月来对《三家巷》《苦斗》的討論和批判，这两部作品在革命外衣下面所宣扬的階級調和思想、恋爱至上、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幸福观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已經越来越为人們看清楚了。但是在《三家巷》《苦斗》出版后相当长的时期中，这两部作品不但沒有受到应有的批判，相反地，不少評論者还大力肯定并予以热情的贊扬；甚至在工农兵讀者和文艺界开展了对《三家巷》和《苦斗》的批判，揭露了作品思想实质的严重錯誤，用活生生的事实說明了作品在广大讀者特别是青年中所起的腐蝕作用之后，也还有一些人起来为作品辯护。我們現在想就这些評論中涉及的几个重大理論問題上的严重錯誤傾向提出我們的看法。

一、为什么思想內容服务的艺术性？

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性是不能离开思想內容的，是为思想內容服务的，离开了思想內容，艺术性就沒有什么意义。在《三家巷》和《苦斗》的評論中，有些人大肆贊賞作品的艺术性，我們不准备爭論《三家巷》《苦斗》的艺术性是否真如有些評論者所說的那麼高妙，只想談談这两部作品的艺术性究竟是为什么样的思想內容服务的。

在《三家巷》和《苦斗》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在艺术构思时，的确曾經为自己的作品精心設計出一张蓝图。为了實現自己的創作意图，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作家为作品的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間的关系和情节的发展等等，安排了最合适的总的布局。从《三家巷》和《苦斗》这两部作品的实际內容看，可以发现作家所进行的艺术构思的三条明显的綫索。

首先，作品以代表旧中国城市社会的工人階級、买办資產階級、官僚地主階級的周、陈、何三家之間亲戚、邻里、婚姻、恋爱、盟誓等复杂关系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其中又突出地描写一批年青人的婚姻、恋爱和友誼。不管是階級斗争劍拔弩张，革命和反革命兵戎相見，也不管是白色恐怖盖地遮天，革命处于暫时的低潮，作者总是千方百計地使这三个敌对階級的家庭之間的关系不致破裂，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至歪曲历史的真实，也在所不惜。有些人盛贊《三家巷》布局的“創新”，然而作者的这种布局設計，显然是只适合于表現階級調和思想的。

其次，在人物关系的安排上，作者采取了“烘云托月”的方法，使一切人物的出现都是为了突出周炳而服务，使一切人物的活动都环绕着周炳而转动。类似的方法在其它文学作品中并非没有，但是，在《三家巷》《苦斗》中，“烘云托月”变成了“众星拱月”，所有的一切人物，都是为了抬高和陪衬周炳这个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英雄”，而这位“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切基本特征的人物。这位“英雄”性格的发展，在作品中是不受环境和人物关系所制约的，作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把若干自己认为是“美好的”品质附加在周炳身上，然后依次让各种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来赞扬、表现、衬托他的某一性格特征，例如勇敢、憨厚、纯朴、正直、痴情、美貌等等。在关于这两部作品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指出，作为革命者的周炳和各种反动阶级人物打过交道，却没有受到真正的阶级压迫；有些同志批评作者把共产党员的形象写得苍白贫血；有些同志抗议作品歪曲了工农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这些批评都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当然，假如敌对阶级分子不象作品中所写的那样“仁慈”而按照他们的阶级本性认真和周炳斗争起来，假如把党员形象写成具有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正确地体现党的光辉和力量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样子，假如真实地反映了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那末，作者如何可能尽情歌颂周炳这样一个热衷于追求个人奋斗、个人幸福、个人荣誉，常常表现出阶级调和的“英雄”，又如何能为周炳身上出自“人类的至情至性”的“痴、傻、憨、直”唱赞歌呢？

还有，在周炳的生活道路上，作者不断地为他安排出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美人，这些“美人儿”只要一靠近周炳的身边，不是被周炳迷住了，就是迷住了周炳。作者说过：“如果主人公获得幸福的爱情，那末小说也就要结束了。”^①作者的这个创作意图，在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爱情线索在作品中的确占了头等重要的位置，而且起了头等重要的作用。爱情，是人物性格发展的杠杆；爱情，是故事情节展开的纽带；爱情，又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调节器。《三家巷》和《苦斗》，实际上也就是周炳走“桃花运”的实录。一部宣称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作品，却把描写儿女风情、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生活放在主要的位置，这是为了什么呢？很显然，因为这样的构思，最适合于表现作者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审美观和恋爱观，最适合于掺进作者十分感到兴趣的色情描写，最适合于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调和思想。

自然，除了上面所说的三条线索之外，在《三家巷》和《苦斗》中，还有一条写革命斗争的线索。然而，读者看到的是对于革命斗争历史的歪曲。特别令人奇怪的是，一接触到革命斗争，作者编织“三家”之间那种说不清的关系、刻划周炳“痴、傻、憨、直”的性格、描绘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艺术才能，似乎都无能为力了。《三家巷》写到的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直到广州起义这一系列的革命历史事件，都是既无“来龙”，又少“去脉”，在作品中看不出革命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看不到各

^① 《欧阳山谈〈三家巷〉》，载《羊城晚报》1959年12月5日。

次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革命斗争其实只是由若干个片段勉强连接起来的虚线。到了《苦斗》，革命斗争的线索就更加模糊不清，而为“三家”之间的恩恩怨怨和爱情肉欲的追逐所淹没了。这就说明了作者的艺术构思着力之处在彼而不在此。

作者的艺术构思既然为作品设计了最能歌颂周炳这个小资产阶级英雄，表现阶级调和和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蓝图，作品的艺术描写自然也必需和总体设计相适应，这就是那些充满着作品的同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不相称的一幅幅爱情生活的抒情小景，工笔细描的美人肖像，平静安宁的南方风俗画。还有的就是对于肉感美的大胆而细腻的描写与欣赏，拥抱、接吻以及从黄色小说中抄袭来的露骨的色情描绘。写革命，写阶级斗争，或尽情歪曲，或轻描淡写；写爱情，写美色，精雕细刻，多彩多姿，可以说就是《三家巷》《苦斗》这两部作品艺术描写的特点。

如果说这两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描写也不乏某种艺术性的话，这种艺术性的追求，不过是为了使阶级调和、恋爱至上、个人幸福等等有害的思想内容表现得更为精巧，从无产阶级的艺术观来看，这种“艺术性”毫无价值可言。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①但是，有些评论中所赞赏的，却正是这样的艺术性。事实证明，《三家巷》和《苦斗》正是这样的作品，它的艺术性，不过是包在阶级调和、恋爱至上、个人幸福等毒药上的糖衣，曾经毒害过不少青年。这样的艺术性，不但不应称颂，而且应该排斥。

二、作品对周炳的错误已进行必要的批判了吗？

一些为《三家巷》《苦斗》辩护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周炳身上带有不少“缺点”，但是，他们又说，对于周炳这些“缺点”，作品中已经作了批判。照他们的说法，似乎《三家巷》《苦斗》不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而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了。在持有这种观点的文章中，穆俊杰等同志是论述得最具体和最系统的。他们认为作者通过周炳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如周炳在《苦斗》中跟胡杏谈自己过去对革命的认识不足）、通过其他人物对周炳的批评（如区桃死后，周炳消极、悲观，受到陶华、周金的批评）、通过作品情节的描写（如周金牺牲的情节）等三种方式，已经对周炳作了适当的批判，因而“决不能因为作家很少直接的议论，就说作家对周炳的缺点没有进行必要的批判。”^②

穆俊杰等同志所说的作品对人物形象进行批判的几种方式，作为一般的道理，也是可以同意的。事实上，从来也没有人主张过，作家只有直接发议论，才算是人物进行

①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第74页。

② 穆俊杰等：《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批判。但是，对于《三家巷》《苦斗》这两部具体的作品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作者是否进行了批判和运用了那种批判方式，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批判，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否真正达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批判目的？文学作品中的批判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讲批判，资产阶级文学也讲批判，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它的批判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否定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坚决与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决裂，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服务的。因此无产阶级文学的批判是一种最彻底的革命的批判，也是文学史上一切阶级所不可能有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如被高尔基称为“浪子文学”的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上是以批判、暴露著称的，但是它们的批判、暴露，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对此，高尔基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文学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它只有阶级的‘战略’所必需的（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在巩固政权斗争中所犯的错误的）那么多的批判。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目的是为了与‘旧世界’的残余及其有害影响进行斗争，是为了根除这些影响，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激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①在另一处他又补充说：“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按：即指批判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而且现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或者——更坏一些——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了的东西。”^②高尔基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由于作家所站的阶级立场不同，它们所作的批判亦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三家巷》《苦斗》对周炳的错误思想行为有什么批判的话，充其量也就是高尔基所指出的那种“更坏一些”的批判。就以区桃牺牲后那一段情节来说吧，作者以整整一章篇幅来描写周炳如何痛不欲生，神智昏迷，凡乎就要做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所常见的以身自殉的“情痴”。然而在下一章，简直是变魔术一样，陶华批评了他一句“孱头”，区苏点了一点头，马上“雨过天晴”，周炳又成为罢工委员会的“英雄”。这一句“孱头”，果真有这样大的批判力量吗？它既没有接触到周炳恋爱至上的个人主义实质，又没有引起周炳内心的思想斗争，更不能改变在前一章中读者对周炳的印象。为什么同是这个恋爱至上的周炳一下子就会变成英雄呢？作者实际上只是告诉给读者，象周炳那样对爱情的真挚，和个人复仇思想，可以转化成为革命的动力，并且发出伟大的力量。这不是表面上批判周炳的恋爱至上主义，实则是赞扬这些东西吗？至于周金牺牲的情节描述，与其说是作者对周炳进行批判，倒不如说作者是在为周炳开脱，同时也在为陈文婷开脱。客观上作品只是告诉读者：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只是由于天真无知，只是由于爱情的苦恼，犯下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可宽恕的罪行，断送了一个革命

① 高尔基：《给谢尔巴科夫》，见《给青年作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

②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同志，一个自己的亲人的性命。这倒有点西方悲剧中命运之神作弄人的味道，却没有无产阶级的批判气息。在我们看来，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一员的周炳，不顾革命纪律，把秘密泄露给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有意识的，都是一个严重的丧失立场的行为。有些评论者把这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缺乏革命警惕性”，已经是“宽大无边”了。究之作品实际，连这点“缺乏革命警惕性”也没有批判好。在作品中，直到《苦斗》结束，作者一直故意不让周炳知道事情的真相，故意使这一笔血债始终成为一个“谜”，这样，作品中的周炳就无须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内疚，继续扮演他的英雄角色，难道这也算是一种批判吗？更妙的是，每当作者对周炳作虚幌一枪的“批判”之后，跟着就来个更大的赞扬。就是这个严重丧失立场的周炳，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在广州起义中摇身一变而成为立场坚定、勇敢善战的斗士。这难道不是高尔基所说的“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了的东西”吗？这和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的批判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可见，穆俊杰等同志只谈文学作品批判的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而不谈作者是从什么立场进行什么样的批判，是不能为《三家巷》《苦斗》的思想倾向辩护的。可是，有人比穆俊杰等同志走得更远，认为“看作家对所写人物的弱点有否批判，应该看他描绘某人物的弱点最终能否使读者觉察到。”^①照此说来，甚至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反动作品，只要我们阅读时觉察到作品中人物的“弱点”，就等于作者对他的人物的“弱点”进行批判了。这些同志费尽心机为《三家巷》《苦斗》辩护，竟然不惜把自己推向如此荒谬的地步！我们认为，这样的评论，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极端有害的理论，革命作家对待人物的缺点和错误可以不需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对一切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可以采取客观主义和不加批判的态度。这种理论和我们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性是绝不相容的。

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还是“独特环境中的独特性格”？

如果人们用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对《三家巷》《苦斗》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本来是不难发现其中对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所作的歪曲，以及通过周炳形象所流露出来的有害的思想观点的。但是，在《三家巷》《苦斗》的讨论中，当有人对周炳的性格塑造提出批评，指出作者把属于思想意识和政治道德品质的严重缺陷加在正面人物身上，指出按照作品所描划的周炳的精神世界，他显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提出对这样的人物，作品并没有很好地表现他的改造过程，因此使周炳的性格缺乏典型意义的时候，有些评论者却以所谓“特定环境”和“特定性格”来为周炳性格的典型性辩护。他们说，周炳是“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所形成的“特定性格”，有其“独特的个性”^②，“周炳既然生活在三家巷这样的具体环境中，又和陈何两家有着这样特殊的

① 初立：《为〈三家巷〉〈苦斗〉一辩》，《羊城晚报》1964年11月6日。

② 马焯荣：《也论周炳》，《光明日报》1960年12月7日。

关系，这就决定了周炳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复杂性。”^①等等。在他们看来，三家巷的环境是独特的，周炳的性格也是独特的，作家只有这样写才真实，才有教育意义，才典型。他们指摘别人对周炳的性格的批评是教条主义，“只会引导作者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只能得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的结论。

他们所说的“特定环境”、“特定性格”、“独特的个性”等等，是否符合无产阶级文学的典型理论呢？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批评了哈克纳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把伦敦的工人写得太消极，认为当时的工人阶级经过了几十年的战斗，已经不是消极被动的群众，他们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恩格斯提出“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并且认为哈克纳斯所描写的工人是不够典型的。因为它没有概括集中当时工人阶级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典型的根本要求，不仅仅是细节的真实，还必须要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够反映出历史生活的本质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典型的个性和共性必须是辩证统一的：既要有生动鲜明的个性的特征，又要概括集中反映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某些共同本质特征。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②

然而，所谓“特定环境”和“特定性格”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一提法在实质上只是把任何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当作典型的东西。按照无产阶级文学关于典型的理论看来，三家巷这个环境是不典型的，这是因为三家巷中三家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能集中概括出二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跟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的阶级关系。二十年代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团结其他革命阶级，与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尤其是当时三家巷所在地的广州，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暴正是从这里卷起，革命的矛头则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阶级阵营壁垒森严。但是，作品中的工人阶级周家，却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以及官僚地主阶级的何家保持着那么亲密的关系，对反动阶级毫无仇恨，而作为反动阶级的陈、何两家对周家不但没有压迫和剥削，反而给予经济上的接济和政治上的庇护，这能说它是集中概括了我国大革命年代这三个阶级的带普遍性的关系吗？能说它是“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吗？能说三家巷是个典型环境吗？当然不能！同样，按照无产阶级文学关于典型的理论看来，周炳的性格也是不典型的，这是因为它并不能集中概括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在二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早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成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工人和党的优秀儿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表现

① 庄犁、方耘：《简评〈三家巷〉评论中的一些问题》，《羊城晚报》1961年4月27日。

② 《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第65页。

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而周炳的性格却是那么软弱、动摇，思想意识、政治道德品质有那么多缺陷，阶级立场是那么不坚定，在他身上两种思想、两种品质、两种立场长期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性格分裂的人物，能说他集中概括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面貌吗？能说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典型吗？当然不能！所以，三家巷这个特定环境和周炳这个特定性格是“独特的”，却是不真实的，不典型的，绝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性格”论者看来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三家巷的周、陈、何三家的关系虽然那么特殊，和旧中国工人阶级跟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间的关系不同，但也不能说它不真实，不典型，因为它是“特定环境”；同样，周炳的性格虽然那么复杂，他的道路虽然那么特殊，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道路及其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不相同，但也不能说他不真实，不典型，因为周炳是“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特定性格”，有他的“独特性”。因此，周炳就只能塑造成这个样子。如果按照无产阶级文学的典型理论去要求把三家巷中三家的关系的处理，符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阶级关系的本质特征；要求不要把政治道德品质上的严重缺陷加在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周炳的身上，他们就认为是“用抽象的理论概念去衡量”，“从主观制定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固定标准出发”，就只会“引导作者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就只能得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结论。总之，一方面他们承认三家巷中的三家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旧中国工人阶级跟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之间的剥削压迫的关系不同，反对用三个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的本质特征去要求它，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它是典型的环境；一方面，承认周炳的复杂性格和一般的工人阶级及其英雄的道德品质、精神面貌不相同，反对用工人阶级英雄人物及其它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去要求他，但另一方面，又说他是典型的性格。这实际上不是说任何个别的、不是从社会生活集中概括起来的反映本质的东西，都是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的吗？这实质上不是把独特性、个别性绝对化，排斥集中概括的典型化过程，使文艺创作停留在对个别事物的模写上，认为这就完成了典型创造的任务吗？这种理论，显然是同恩格斯的典型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典型化的教导背道而驰的。

“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性格”论者断言，不承认三家巷环境和周炳性格的复杂性（或叫独特性）具有典型意义，就是教条主义，就会得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的结论。我们认为，这种指摘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确实有人提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的理论，那是应该反对的。可是要求无产阶级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不能在思想意识和政治道德品质上有象周炳那样严重的缺陷，不能表现出性格分裂——因为这样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这和“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有什么相干呢？这种要求绝不会限制文学艺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在我们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的典型，其中不少都是既有自己丰富的个性，又体现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某些共同本质。我们并不否认，文学艺术的形象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典型是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并不是不可以写复杂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独特性和复杂

性是否能体现出一定时代和阶级的某些本质特征。根据“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和人物性格应当是从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现象中集中概括起来的个别。三家巷既然是作为“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它们的关系无论如何复杂都必须是在集中概括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某些共同本质基础上的“个别”环境，周炳既然是作为代表中国民主革命的来龙去脉的“一代风流”人物，他的性格无论如何复杂都必须是在集中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某些共同本质基础上的“个别”性格。但是，这两部作品的实际却不是如此。三家巷那种“独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周炳那种“独特”的复杂性格，都是没有典型意义的。既然如此，评论者那么强调这种“特定环境”、“特定性格”（或者叫独特环境、独特性格）有什么好处呢？评论者硬说这种“特定环境”、“特定性格”是典型的，这岂不是等于承认作品中的任何环境、任何人物，都可以是“特定环境”、“特定性格”，而作家只要把它们“塑造成这个样子”，也就完成了典型塑造的任务吗？这种只强调个性，排除共性，不谈集中，不要概括的理论同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典型的理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近几个月来，全国广大工农兵读者和文艺界对《三家巷》《苦斗》进行了重新评价，并且对作品所散播的思想毒素作了有力的批判，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说：“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①文艺评论工作者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哨兵。我们的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在文艺领域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维护和鼓励一切遵循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本方向的创作，坚决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观点作斗争；帮助和提高读者在文艺欣赏中鉴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抵制和消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毒素。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首先也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有些评论者对《三家巷》《苦斗》所以作出不正确的评价，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离开了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任务，从而他们在理论上就不能不产生错误。因此，工农兵读者对《三家巷》《苦斗》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革命感情，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① 《毛泽东论文艺》，第97页。

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 对中国的侵略简述

王 志 光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引起了反抗。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展开了夺取租借地、争夺路矿特权、分割势力范围的斗争，企图瓜分中国，变中国为各自的殖民地。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加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它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在中国革命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次运动遭到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力量的血腥屠杀和镇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英国、德国等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于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的军事进攻。最后，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共同绞杀了这次革命。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充分暴露了它的凶残、狡猾、阴险、无耻的侵略者的本性。

十九世纪末，随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形成和迅速发展，美帝国主义强烈地要求向外扩张，妄图夺取世界霸权。向远东地区扩张，变太平洋为一美国湖是其侵略计划中的主要目标之一。一八九八年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是世界史上第一个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大大地加强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而对菲律宾的占领，则是“通往亚洲和中国的一步”当时，美国参议员贝佛里奇就这样公开叫嚣：“菲律宾永远是我們的，正如宪法把它叫做‘属于美国的领土’的那样。只要一跨过菲律宾，就有着中国的无穷尽的市场。我們將不愿从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里撤退出来。我們不愿意放弃在这些多島海上的責任。我們不愿放弃我們在远东的机会。”^①所以当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便认为这是加紧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中的侵华叫嚣，猖狂一时，紛紛要求派遣“討伐軍”来华，給起义者以“懲罰示众”。代表美国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华美合兴公司”和美国亚洲协会积极活动，力促美国政府加紧侵华步骤。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向国务卿海約翰建議在天津常駐美国舰队，并在渤海湾占領一个海軍基地。一九〇〇年初，康格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要求“下令指明对义和团和大刀会予以全部取締”^②，并以武装干涉相威胁。接着便于三月，調动軍舰在中国領海上組織了第一次的武装示威。美国国务卿六月八日給康格的指示說：“但能办到，即以单独

① （美）福克納：《美国經濟史》，商务印书館1964年版，下卷，第261頁。

②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9頁。

行动保护美国利益。”这就是說，美国一开始是企图对中国实行单独的武装干涉的。只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各国之間的矛盾，由于美軍統帥部还没有作好充分的战争部署，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不敢单独承担这一场侵略战争的风险，才没有实现单独的武装侵略。

在八国联軍进攻中国的整个过程中，美国軍隊“最积极地参加了軍事行动”，并竭力表現它是“永远地站在最前哨”。美国軍隊是从大沽进入天津的第一批外国軍隊。在进攻北京时，美軍第十四步兵团象疯狗一样最先闖进了北京城。联軍在中国各地，疯狂地烧杀搶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对于美軍在中国的搶劫屠杀暴行，我們从当时美軍第十四步兵团团长达格特（A.S.Dagget）所写的《美軍在华解围远征記》一书中^①可以找到具体的記載。这是侵略者自己的供状。

当联軍进入北京后，“混乱和搶劫主宰着一切”。在美軍占領的北京西南部，肆无忌惮的搶劫一直没有停止过。作者写道：“我們也时常派出部队去征发粮草和牛羊，离城十五到二十英里的乡村里的东西都弄光了。”在天津的搶劫更甚于北京，特别是在美軍占領下的东南部搶劫持續的时间最长。作者写了他們一次对鑄币厂的搶劫中，共搶到銀子总值达美金三十七万六千三百元，“这些財物被运到汇丰銀行，卖给摩尔根的代理人木勒（C.H. C.Moller），并且全部存在美国国库中。”据一个当时的英国随軍記者証实，在美国的天津領事館內堆放着大批搶到的銀子，其数量大約有三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寬、四十英尺高^②。难怪他认为“美国軍人的能力，特別明显表現在（对中国的）搶劫行动上。”^③至于那些不能带回美国的財物，除了大量毁坏之外，便在当地进行公开的拍卖。达格特竟恬不知耻地說，“用这笔收入来支付軍隊的开支，这是一种合法的交易！”这真是十足的杀人越貨的强盜哲学。

据达格特供认，他們占領北京后，經常派遣所謂“懲罰性征討队”到乡村中去，“这些征討队杀了成千无辜的中国人。”“美軍所从事的一次最重要的征討是在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沿着渾河到八大处附近，离北京西北約十五英里多的地方。这次征討队由九一五名美軍步兵、炮兵和騎兵以及大約同等数量的英軍組成，由美軍威尔逊將軍指揮”，結果，出征三天，“杀死了相当多的中国人”。就是这个双手沾滿中国人民鮮血的威尔逊，在其回忆录中記述了在一九〇〇年秋季和冬季，大批的美国軍隊出发到华北各地进行“征討”的情况^④，他还承认，在“征討队”前往的地区，并没有碰到起义者。也就是說，这种“征討”完全是为了搶劫和屠杀那些手无寸鉄的和平居民，“成千成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放蕩下被杀了。”連联軍統帥互德西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軍隊的紀律“极为敗坏”^⑤。

① 达格特：《美軍在华解围远征記》，載天津历史研究所編：《义和团史料》（四）。以下凡同一作者言論，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② 薩威奇——兰德尔：《中国与联軍》，第1卷，第204—205頁。

③ 同上引书，第200頁。

④ 威尔逊：《在古老的旗帜下》，第2卷，第531頁。

⑤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121頁。

从上面这些出自侵略者自己口里的記載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一直抱着侵略中国領土的野心，而美国軍隊不过是一群在屠杀和掠夺中国人民中最残暴、最凶恶的劊子手和强盜！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人民发动了武装进攻，在中国实行疯狂搶劫和血腥屠杀，同时还使用了和平欺騙的手法，来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继一八九九年九月間美国向各列强提出了第一次“門戶开放”照会后，国务卿海約翰又于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向美国駐外国的外交代表发出了一个对于中国問題的通牒，反复申說要对中国人民“保持和平友好”，“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領土与行政完整”，等等，力图把自己装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和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与其他一些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区别开来，达到籠絡清朝統治者，欺騙和麻痹中国人民的目的。

但是，豺狼毕竟是豺狼，不管它披上了什么样的外衣。鉄的事实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这种假和平、真侵略的本质。美国是最坚决主张对中国实行武装干涉的。美国駐天津領事的一个报告很好地說明了这种情况：“（在六月八日天津的一次領事团會議上），我主张即刻派兵前往。英、日、德、意、奧各国代表贊成我的建議，但是一直等到勇敢的麦卡拉(B.H.Mocalla)（美軍上校，当时联軍远征軍副司令）率直地宣布：‘我們的公使已經电告領事，我們的同胞現在非常困苦，除非援軍即时开往，他們都要完了。我提議，明早离开这里到北京去’。俄国代表和法国代表方才让步。于是向总督提出要求，把这八百人运往北京。”^①六月十日，一支有美国参加的大約二千五百人的远征軍从天津出发，向北京推进。这支侵略軍在义和团的頑强抗击下，遭到惨敗，只得狼狽逃回天津。这期間，美国积极从各地增調軍隊来华，鎮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六月十二日，美海軍陆战队第一团的一个营离开菲律宾的卡維特开赴中国；二十七日，美国第九步兵团奉命从馬尼拉灣登船启程来华；七月一日，美国第六騎兵团奉命在旧金山登船，开赴中国；十五日，美国第十四步兵团从馬尼拉出发来华。^②此外，美国政府还决定，七月中旬增派士兵一万名来华，这支軍隊后因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而中途留下，沒有到中国。这就是美国在发表通牒前后最簡單的軍事調动日程表。从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謂对中国“保持和平和友好”，不过是对中国发动战争和侵略的代名詞罢了。侵略者总是妄图用欺騙和謊言来掩盖其丑恶面目，結果，正好暴露了它的狡猾、伪善的本性。

所謂“保持中国的領土与行政完整”同样是騙人的鬼話。早在美西战争前，美国海軍部就企图夺取威海卫为軍事基地。美西战后，美国駐烟台領事曾建議在中国的烟台、舟山群島、台州、登州和庙島中选择一个为美国海軍基地。一八九九年三月，美国駐华公使康格向国务卿建議划直隶为美国势力范围，并占領天津作为美国海軍基地。一九〇〇年六、七月間，正是美国又一次高唱“保持中国領土与行政完整”的时候，美国海軍

① 朱士嘉：《十九世紀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輯》，上册，第235頁。

② 《美軍在华解围远征記》，第2—9章。

部再度提出占領舟山群島的問題。十一月十九日，海約翰致电康格，要他抓住机会替美国获得福建三沙湾的专用权作为海軍軍港。这些都表明，处心积虑破坏中国領土与行政完整的正是美帝国主义自己。

既然美国长期以来便对中国抱有領土野心，为什么又要高唱“門戶开放”、“保持中国領土与行政完整”呢？这是因为，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計劃中，并不滿足于在中国获取个别地区作为侵略基地，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扩张其在中国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势力，最后达到独吞整个中国的可耻目的。就是說，美国企图在“門戶开放”、“保全中国”的幌子下逐步排挤和压倒其他列强，最后把一个“領土和行政完整”而又全部对外开放的半殖民地中国，变成美国的独占物。所以，“保全中国領土与行政完整”实际上就是要排挤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使地大物博的中国完全淪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当然，在沒有实现它的独占野心之前，它是决不会放弃掠取一块势力范围的。这一点，美国总统麦金萊作了不打自招的供詞，他說：“我不知道什么領土野心 不領土野心，假如有一天中国被瓜分，我們也可以取到一块嗎？”所以，就在义和团运动期間，美国向其他列强提出什么“保持中国領土与行政完整”的同时，它自己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占領中国的舟山群島和三沙湾。这一切，都說明了在好听的名詞背后，包藏着的却是一个更加狂妄的侵略野心，和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

可是，美帝国主义的辯护士和中外反动学者，却硬說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阻止了中国被瓜分。这是顛倒黑白的弥天大謊。阻止瓜分計劃实现的是中国人民的斗争，而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什么政策和原則。英勇不屈的义和团在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毫不畏惧，凭着大刀、长矛这些簡陋的武器，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認識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感到“無論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腦力与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①。它們不能不暂时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毒計。这里說明了一个真理：真正有力量的，是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中国人民，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中国人民在腐敗的清朝政府的統治下，帝国主义从中国人民手里得不到的东西，却从清朝政府手里大批大批地搶夺去了。八国联軍和清朝政府簽訂的辛丑条約，就是帝国主义的分赃条約，就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条沉重的鎖鏈。在辛丑条約締結过程中，美帝国主义的阴险狡猾的面目就更是暴露无遺了。

对于这样一个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条約，美帝国主义当然是十分滿意的。它不仅从中分赃得到了三千二百九十余万两，加入利息共七千一百八十万两的賠款以及其他种种特权，更重要的是，辛丑条約为美国資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造成了有利条件。一九〇二年，美国花旗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积极发展美国在华貿易、投資和金融势力。一九〇三年十月，与清政府簽訂了新的商約，获得了加开商埠等更多的貿易特权。因

^①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244頁。

此，辛丑条約后，美国对华投資有了显著的增加，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增加将近一倍。特别是辛丑条約还規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集会，违者皆斬；規定各省督撫文武官員于所属境內发现有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事情，必須立时弹压惩办；規定“允将大沽口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口通道之炮台一律削平”；規定允許外国侵略者在华北許多重要地方駐兵，以便控制北京至海口的交通。这許許多多的穷凶极恶的規定，当然不是什么“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而是妄图解除中国的国防，取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权利，使外国侵略者获得“永久安全”，使它們能够肆无忌惮地剝削和奴役中国人民。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花言巧語，都必須而且只能从它的反面去理解。任何人如果輕信了这个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口中漂亮好听的言詞，而忘記了它穷凶极恶的本性，就会中它的阴謀詭計，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及世界的和平事业遭到严重的損失。

刘节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批判

魏 俊 超

刘节先生在广东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的座談会上大肆宣扬他的所謂“抽象继承法”，他說：“許多人說，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只能是批判继承。我看不談继承則已，談继承多半是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法事实上存在，这是好的办法。”^①显然，刘先生对于怎样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所作的这个結論，是与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观点針鋒相对的。这个方法是刘先生在历史研究中一貫采用的方法，也是他近几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始終貫徹着的方法。这里只就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具体問題作些分析，看看刘先生是怎样用“抽象继承”来对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继承，以及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坚持这个反唯物辯証法的方法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刘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元論就建立在天人合一說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題下，他巧妙地把唯物論的荀子与唯心論的孟子的思想冲突，唯物論的柳宗元、刘禹錫与唯心論的韓愈的思想冲突，統統說成只是对“天人合一”的認識“程度”和如何實現“天人合一”之間的冲突。这样，貫穿着中国思想史領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不見了，唯物論思想家与唯心論思想家这两大陣营不見了，剩下的就只是一部“彼此一家”的“天人合一”史，而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也就都属于“天人合一”論者了。

我們知道，中国思想史是一部具有階級內容的战斗的思想史，它决不是天人关系这个命題所能概括得了的，更不是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这个命題所能概括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属于唯物論的一元論，有属于唯心論的一元論，也絕不是“一元論就建立在天人合一說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用不着論述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名实問題的論爭，神不灭与神灭的論爭，理与气、道与器的論爭，等等，都鮮明地反映出哲学問題的論战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和反映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来就是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陣营，反映出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即以天人关系而論，也是异常明显地表現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天道观的根本对立和斗争。例如孟子与荀子关于天道观的对立，就决不是如刘先生所說的是“尽伦”与“尽制”的分歧，而是承认天是有意志的宇宙的主宰，人必須成为上帝的奴隶；还是承认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人可以“制天命而用

^① 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第106頁

之”的分歧。在这种不可調和的对立斗争中，孟子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唯心論者，而荀子則是主张“明天人之分”的唯物論者。这种根本对立的天道观，在唐代也表現得非常突出。继承孟子以来的唯心主义的天道观的韓愈，认为天是能够“賞功罰禍”的人格神，人不应当用人力来改变天意；而柳宗元則认为“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只不过是物质的天，根本不能“賞功罰禍”。刘禹錫也认为，天是有形的物质，它不能“預乃人事”，并且提出要“天人交相胜”。由此可見，唯物論者从来就是针对唯心論者的謬論，进行着針鋒相对的斗争的。这种針鋒相对的斗争，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列宁說得好，“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來說，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①但是，在刘节先生的观点里，恰恰是抹煞了唯物論同唯心論的斗争，抹煞了唯物論与唯心論斗争的党派性，从而把根本对立的思想、学說、观点融合和調和起来。

我們知道，一切思想、学說的党派性是与它的时代性有着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每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維（我們这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維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②如果抹煞一切思想、学說的党派性，也就必然要抹煞一切思想、学說的时代性。看来，刘先生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就是这样。例如，他在談到孔子的“礼”的时候說：“‘礼’是各种社会共行之秩序”，它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实，只要稍具有一点历史常識的人都会明白，孔子的“礼”，一般說来，是指“周礼”，它的根本的內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既是一种等級的关系，又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当时社会的作用，就是要以此来維護統治階級的社会秩序，企图挽回当时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动荡的社会局面，挽回那种“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被认为是“犯上作乱”的社会现象。具有这样的社会时代特征的“礼”，怎么可以超出历史时代，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孔子的“礼”，不可能超越历史时代，成为“各种社会共行之秩序”，那么，刘先生用什么方法使它具有万古不变的普遍意义的呢？刘先生說，“从孔子以后到了孟子，已經（把礼）归納出一个抽象意义了。”所以，“‘礼’之一义必然存在的。这样的‘礼’非指‘社会秩序’不可。”原来，并不是孔子的“礼”可以超时代，而是刘先生在这里抽去了思想、学說总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賦予了孔子的“礼”以“抽象意义”，使孔子的“礼”可以成为“各种社会的共行秩序”。

刘先生这种对孔子的“礼”的抽象法，对于刘先生的历史研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礼”是这样，对于孔子的“仁”也是如此。他說：“‘仁’的本质就是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第379頁。

②.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

情，也就是人情”，“孔子的唯仁論，实在是一种如何培养对人类伟大感情的教育哲学”，又說，孔子的“仁”，“虽然是就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行为讲，即用之于现代，你说有什么害处呢？”刘先生企图抽去孔子的“仁”的阶级属性，把它說成是既可以为封建社会服务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超阶级的东西，这在方法論上同对“礼”的理解同样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們知道，决定一种事物的本质，不是根据它的形式，更不是根据它的抽象概念，而是根据它的具体内容。孔子的“仁”的主要内容就是“孝、悌、忠、恕”。而提倡孝、悌、忠、恕又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一点，孔子的弟子有子有过一段很具体的表白，他說：“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显然，提倡以“孝、悌、忠、恕”为主要内容的“仁”，就为了防止“犯上”，防止“作乱”，以维护封建阶级的統治，这显然是阶级統治的一种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决不是如刘先生所說的，“仁”是超阶级的“感情”、“人情”。事实上，孔子的“仁”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就連孔子自己也不曾隱諱，他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既然对人有好恶之别，而这种好恶又是以“仁”、“礼”为标准的，怎么可以說“仁”是超阶级的“感情”、“人情”呢？而这种具有一定时代和一定阶级内容的“仁”，更怎么可以用之于“现代”呢？原来，刘节先生运用“抽象继承法”抽去孔子“仁”的实有的阶级性，赋予“仁”以“抽象意义”，是为了使孔子的“仁”变成“从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纳出来的抽象名詞”，是为了把“‘仁’的抽象意义”說成是“万古不变的”。从而得出孔子的“仁”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有用之物”的反科学的結論。

从以上具体事例的分析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刘先生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彻头彻尾地坚持着超党派性、超时代性和超阶级性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的。这就难怪他要一贯地坚持认为一切思想、学說、道德都“不带有学派的限制，不带有时代的限制，也不带有阶级的限制”了^①。刘节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正是以他的这个“三不限”为其核心的。

刘节先生从来都沒有忘記他的历史研究是要“古为今用”的，即要以他的唯心史观来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他这样卖力地宣扬所謂“抽象继承法”，自然也有其目的性的。这就是企图在“抽象继承”的幌子下，抽掉哲学、道德概念中的具体内容，使这类概念成为超时代、超党性、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先验的形式、公式或名称，以便于他借历史研究之名，行以古喻今，借古非今之实。我們必須在批判刘先生的反动历史观的同时，揭露他的这种为其反动历史观服务的方法論。

唯物辯証法并不否认对事物的抽象，恰恰相反，它认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必須使用科学的抽象方法。但是，正确的科学的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科学概括，离开具体事物，就无从进行正确的抽象。列宁說：“物质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

^① 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这就說明了，具体事物是科学抽象的出发点，而一經科学的抽象，又更鮮明地准确地反映了具体事物的本质。所以，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科学抽象，才是可靠的抽象，才是有本有源的东西，才是真正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的正确概念，才能使人們对具体事物得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認識。这也就說明了，事物是概念的出发点，又是它的終点，两者是互相联結的。而这种联結，就寓于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之中。

既然概念是具体事物的抽象，而不是虛无縹緲的不可捉摸的“幽灵”，那末，我們继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要继承什么，否定什么，也只能是具体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比方，我們认为不能继承孔子的“仁”以“作为社会主义有用之物”，就在于以孝、悌、忠、恕为內容的“仁”这个特殊的事物本质，是维护封建剝削階級的利益，维护剝削階級的統治的。所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子为父隱”的“孝”的階級內容，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階級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人硬要继承孔子的“孝”，并把这种道德规范强加于社会主义社会，那末，他就必然要遭到无产階級的反击。又比如，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关于名实关系問題的論爭，就是唯物論同唯心論两条路綫的斗爭。一切的唯物論者，只能继承存在（实）决定思維（名）的命題，实决定名的命題，否定唯心論的思維决定存在的命題，名决定实的命題。而一切的唯心論者，則恰好相反，他們所要继承的必然是思維决定存在的命題，名决定实的命題，而否定存在决定思維的命題，实决定名的命題。可見，不談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則已，要談继承必然是具体的继承。只是不遺余力的提倡所謂“抽象继承法”的人，才表面上讲“抽象”，但实际上也仍然是具体的。刘节先生不就是要把封建社会的秩序（“礼”）硬塞到社会主义社会来，不就是要把封建階級的道德规范（“仁”）硬塞到无产階級的道德规范中来，而要我們“遵行”的嗎？！

上述种种情况都說明了这样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这条真理就是如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显然，如果象刘节先生那样，离开了具体事物，空洞地談論什么“抽象意义”，談論什么“‘仁’是‘从古及今’各种具体事物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那末，抽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結果只能是不論任何哲学、道德的概念都变成了不可捉摸的先验的形式、公式或名称。这种取消一切概念的具体內容的所謂“抽象继承法”，只不过是一种騙人的魔术罢了。

既然“抽象继承”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刘节先生却要不遺余力地宣扬这个“办法”，并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貫徹着这个“办法”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刘节先生真个是为了什么“古代的优良传统”，竭力想把它发掘出来，“作为社会主义有用之物”；

^① 列宁：《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

而实际上則是別有用心的。刘节先生說，“我是研究历史的”，可惜的是象刘节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承认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都是有时代性、党派性和阶级性的。所有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道路来研究历史的人，都应当承认要批判地继承有用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古为今用，这就一定要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处理历史文化遗产，决不能把糟粕当作精华向人們推荐。但是这并不是刘先生的愿望，而是他坚决反对的目标。因此他极力指責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处理历史文化遗产是“把好好的东西糟塌掉了”，倡言要“撇开馬列主义理論”来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問題。这就是他說的，只有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說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都看成是“不帶有学派的限制，不帶有古今的限制，也不帶有阶级的限制”，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实际上就是为了取消一切思想、学說、道德的阶级界綫，便于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論”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論，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李秀成評價問題上的相对主义

——評苑书义、呂翼祖等同志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洪 雁

在关于李秀成的評價問題的論爭中，苑书义、呂翼祖两同志力图把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綱同志为代表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調和起来，合而为一，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見解虽然是“針鋒相对的”，然而“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也都帶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在他們看来，《李秀成自述》既是“頌扬了敌人、詆毀了革命”，“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又是“頌扬了太平天国前期領袖們的英明和軍事形势的飞跃”，“緬怀天国”。李秀成既是有过“背叛革命的变节行为”；又是一位“农民革命領袖”，“在历史上應該 是基本上肯定的人物”^①。这种把叛徒与英雄“合二而一”、叛徒自白书与革命文献“合二而一”的論調，还不同程度地表現在一川和其他一些作者的文章里面^②。

看来，持这种論調的同志完全沒有自己观点的独立体系。他們仅仅是从爭論双方迥然不同的观点中，东抽一点，西抽一点，从而机械地拼凑出他們的折衷主义的主张来的。

我們认为，这种居間折衷的观点和方法，是以相对主义作为認識論的基础的，是反唯物辯証法的。唯物辯証法认为，每一客观事物都有它的确性质，人們对这种性质的認識不能同时是相反的，符合于客观事物实际的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在評價李秀成这一历史人物的时候，我們就必须把他置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考察，这就是說，李秀成到底是一个在被俘后始終坚持革命立场，宁死不屈的革命者呢？还是一个苟且偷生，临危变节的叛徒？李秀成在敌人囚牢里所写的《自述》，是表現了大义凛然的革命文献呢？还是献諛乞怜，出卖革命的叛徒自白书？在这样的具体問題上，人們的回答必須是明确而肯定的——“非此即彼”，两者必居其一。而苑书义、呂翼祖等同志則采取模稜两可的态度，“亦此亦彼”，“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抹煞真理与謬誤之間的原則界限，混灭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根本区别，从而模糊了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本质認識。他

① 苑书义、呂翼祖：《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載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

② 这些文章包括：一川：《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載1964年8月24日《光明日报》；朱仲玉：《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載1964年8月8日《光明日报》；苏寿桐、吳雁南：《略論李秀成》，載《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祁龙威：《試論李秀成》，載1964年8月15日《文汇报》；謝永雄：《李秀成是叛徒嗎？》，載1964年9月26日《广西日报》等。以下凡引及上述諸文，均不再注明出处。

們否認歷史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否認歷史真理的客觀準繩，這就陷入了相對主義的泥坑。

自然，辯證法在肯定“非此即彼”的同時也在一定的條件下承認“亦此亦彼”，但這和相對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恩格斯說：辯證法只是“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而且“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①運用這個觀點和方法來評價李秀成，我們說“非此即彼”，指的是應該把李秀成具體地評價為叛徒，而決不是什麼革命者；與此同時，我們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指的是事物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自己的反面，李秀成這個叛徒乃是由農民革命將領轉化而成的。我們指出李秀成由革命者向叛徒轉化的事實，絕不是為了把李秀成評價為亦“此”（叛徒）亦“彼”（革命者），而恰好是用以表明李秀成已經是“此”（叛徒）而非“彼”（革命者）了。但苑書義、呂翼祖等同志的相對主義觀點則正好相反，他們一方面完全否定了“非此即彼”的原則，另一方面又不把“亦此亦彼”理解為事物的轉化，而是曲解為事物可以同時具有多種不同的質，於是革命英雄和叛徒這兩個根本對立的概念便在李秀成身上合而為一。

苑書義、呂翼祖等同志在具體論證其折衷性論題時，以貌似“全面性”的外觀出現，要人們既看到《李秀成自述》的“這一方面”，又看到“那一方面”。其實，他們的所謂“全面性”，不外乎是借口存在着多樣性的歷史現象、因素，而不管它們是本質的或虛假的，它們之間的聯繫又如何，一概兼收並蓄、等量齊觀。這正是相對主義的慣用手法之一，它是和唯物辯證法格格不入的。辯證法的全面性要求從歷史現象的多方面的聯繫中，去把握歷史事物的本質和內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李秀成的這份長達數萬言的供詞，由始至終貫串着以“大清民根”自居的反革命立場。通篇充溢着求饒乞降的叛徒的語言，對敵人諸多阿諛獻媚，對太平天國革命事業及其領導人則肆意詆毀侮辱；向敵人招供了農民革命隊伍內部軍事、政治和組織情況的第一手材料；並為清廷出謀獻策，惡毒地提出了瓦解和消滅數十萬仍在堅持戰鬥的革命武裝力量的所謂“招齊章程”的十點計劃。此外，不少當事人如曾國藩、趙烈文、李鴻裔等的直接記敘材料，也對李秀成的變節行為提供了有力的佐證。這一切表明：李秀成的叛變投降現象乃是最本質的現象，《自述》的實質只能是叛徒的自白書。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李秀成在《自述》里確也寫下了若干符合太平天國客觀情況的事實過程，這就不得不同時對天國前期的政局和某些革命領袖有所肯定。但必須指出，這只是李秀成為了迎合敵人的需要所作的忠實招供而已，絲毫也不意味着他對太平天國事業有任何“緬懷”或“頌揚”。根據有關材料記載，李秀成作供是在曾國藩親自審訊並提出“取偽忠王詳供”的要求第二天開始的。後來曾國藩及其幕僚李鴻裔等人還相繼向李秀成提出不少問題，詳細地詢及有關太平天國的歷史與人事情況。正因如此，李秀成為了博得敵人歡心，換取活命，力求做到以“一片虔心寫就，並未瞞隱半分”。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頁。

所以，只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这些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就不难明白，所谓“缅怀天国”或“歌颂革命领袖”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都是服务于他的乞降目的的。

可是，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沉溺于诸现象的罗列，在本质现象之外还去努力搜求一些虚假的现象，企图以一大串纷乱的、彼此孤立的、自相矛盾的历史因素模糊人们对《自述》的本质的认识。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舍本逐末，让假象把《自述》的本质掩盖起来，其实恰好是拒绝历史研究的全面性，也就是最大的片面性；这种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历史现象等量齐观的杂凑也并不构成什么“矛盾的统一体”，而只能是对于历史事物的内在联系的阉割。

其次，这些同志在具体论证其折衷性论题时，还提出了要对李秀成“衡其功过”的论点。一川说：对李秀成的评价要“全面考虑其功绩与过失的统一”。朱仲玉也说：

“我们应当把功绩和投降这两件事放到一起来衡量一下，然后作出公正的论断。”祁龙威也说：“不能够因他的晚节有亏而否定他十余年血战之功；也不能够因他卓著勋绩而曲谅他最后向敌输诚的罪过。任何片面的说法，都不是科学的。”关于这些错误论点，很多同志已经作过正确的批评，这里只想着重指出，这个论点貌似辩证法，实际上是使用了混淆界限、偷换概念的诡辩论。诡辩也是相对主义的惯用手法之一，列宁指出：

“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①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功绩与过失的统一，是指一个革命者在革命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的辩证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考察一个革命者的时候，应该“一分为二”。李秀成由革命者转化为叛徒，就是他已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因此，评价李秀成就不再是什么“衡其功过”的问题，而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问题。

我们知道，叛徒这个概念的含义是革命的敌人，而且是起着特殊反动作用的敌人。叛徒之不同于一般反革命分子，仅仅在于曾混迹革命队伍，但正因为如此，他或多或少地洞悉革命的策略和机密，而能够起到一般反革命分子所不能起的破坏作用。在这里，叛徒过去的革命经历常常被利用来作为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资本，因此，已经消逝的岁月不能为其保留光荣的记录，而只能加重其罪恶。李秀成在根本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同时，便也理所当然地否定了他自己过去对这一事业做出的贡献。故当我们对李秀成这个农民革命的叛徒的一生作出总的评价时，就既不应该把他曾为太平天国做过的一些事情当作一般革命者的“功绩”来吹捧，也不应该把他对太平天国所犯下的叛卖罪行当作革命者的一般“过失”来宽恕。划清敌我界限，乃是评价任何历史人物的一条最根本的界限。

但是，一川等人却把本来是仅适用于革命者和人民内部的功与过、成绩与缺点的矛盾统一的概念，偷偷地套用到革命的叛徒身上去。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第136页。

毛主席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①“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②每一客观事物都有其质的规定性，这就产生了概念的规定性。因此，当我们运用概念来说明李秀成这一历史人物时，就必须使这些概念严格地服从于李秀成是叛徒这一实质性的事实。一川等人把革命者的“功过论”套用到叛徒身上，这既否定了客观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也否定了概念的规定性。他们在评价李秀成时把革命者这个事物的质与叛徒这个事物的质混淆起来，当作同一个事物的质来考察，说什么李秀成的一生，既有缺点，又有成绩，而总的说来是“功大于过”，这正是否定客观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否定概念的质的规定性的必然结果。

通过以上对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的相对主义的若干主要论证手法的分析，可以知道在李秀成评价中的折衷调和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企图借此来歪曲真理、颠倒是非是完全徒劳的。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③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争论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这场论争中，形成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分野。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虽然以貌似公正的调解者面目出现，但事实表明，他们的中间立场是虚伪的。经过比较就可以知道，他们和罗尔纲是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因为从基本论点来看，他们和罗尔纲都同样把李秀成评价为革命英雄。差别仅仅在于：罗尔纲否认李秀成的叛徒行径，把他当作英雄来颂扬；而他们则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李秀成的叛徒行径，即使如此也可以把他当作英雄来颂扬。他们都同样没有无产阶级的是非标准和敌我观念，因而无从识别历史人物的是非，无从划清历史上革命者和叛徒的界限；都同样不用他们的精力和热情去歌颂农民革命史上的真正英雄人物，而是去歌颂象李秀成这样的背叛革命利益的败类，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布阶级调和论和活命哲学的毒菌，适应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需要。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卷，第2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51—352页。

学术研究

一九六五年第一期（总第十九期）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50元
每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